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陸輝 博士



退出、呼籲、忠誠：  
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參與的效能與行動

研究生：蔡儀儂

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

# 本論文承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經費



## 論文摘要

對於比較政治領域，威權政體的「選舉」開放，是否真的會使公民出現自主性參與，一直是學界極為關注的命題。檢視當前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可以發現，參與帶動的「有限政治改革」，其效果仍難以預料。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轉型中政權選舉的制度效應，會對選民個體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帶來何種影響。我們並嘗試從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範疇，提出「防禦性」與「認同性」兩種概念分類，「防禦性」功效意識是由於選民的維權心態激發的投票參與意願，「認同性」效能感是由選舉動員浮現的群體認同投票意識。我們假設，個體同時經歷過「認同性」與「防禦性」兩種功效意識的形塑過程，但又受到個人的「政權支持」程度影響，不可能出現兩種功效意識同時上升的情形。而個別心態傾向會影響後續的政治行動，會有「退出」、「呼籲」、「忠誠」三種行動抉擇。「退出」是不再進場參與投票，「呼籲」走向過激的政治反抗，「忠誠」則是向黨國輸誠。

針對上述假定，本研究以上海 2006、2009 年兩次居委會換屆選舉為研究個案。根據作者田野調查發現，經過選後，防禦性功效意識較高的選民，最終採取「抗議」的政治行動；認同性功效意識較高的選民，雖部分仍表態黨國「忠誠」，但多數參與者卻由於選舉過程無法滿足，浮現「失望」，呈現參與「退出」的情況。因此，「『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選民退出—『高防禦性』功效意識選民呼籲」，構成了社區基層選舉存在著普遍的「集體行動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選舉失望走向從「退出」的行動選擇，卻也可能最終又走向「呼籲」的過激行動。就此觀之，中國的基層民主發展，或許會是面臨集體行動困境之後，走向突發轉折的非預期性後果。

**關鍵詞：**政治參與、基層選舉、中國政治、政治功效意識、政治行動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主題：政治功效意識.....	4
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研究設計.....	8
第一節 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	8
第二節 理論對話：政治功效意識.....	13
第三節 研究設計.....	17
第三章 觀察驗證：居民選舉參與的效益與行動分析.....	25
第一節 城市基層自治組織-「居委會」.....	25
第二節 社區選舉過程的個案比較.....	33
第三節 選舉過程觀察：政治功效意識與參與行動的抉擇.....	43
第四章 效能-行動「銜接機制」：選舉失望浮現的「退出-呼籲」.....	51
第一節 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根源.....	53
第二節「失望」的浮現：選舉預期的「落差效應」.....	57
第三節 選舉開放的制度效應.....	59
第五章 結論.....	64
參考文獻.....	70
附錄一：訪談案例.....	77
附錄二：訪談題綱.....	78

## 圖次

圖 2-1 研究架構圖 .....	17
圖 2-2 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分類模組 .....	21
圖 3-1 城市基層治理的圖像 .....	31
圖 3-2 社區選舉動員架構圖 .....	32

## 表次

表 2-1 政權支持程度與政治功效意識的比較配對 .....	19
表 3-1 社區特徵與選舉過程比較 .....	43
表 3-2 治功效意識與參與行動的關係：研究發現整理 .....	50



# 第一章 緒論

展望當前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自 1990 年代末期以降，伴隨著農村鄉鎮基層選舉的擴張，城市基層選舉日漸突破、逐步擴散。與之相應，基層選舉的突破點，使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日漸頻繁，城市「居民委員會」的換屆選舉，成為居民最直接參與的政治管道。由此展開的發展論辯，參與帶動，及可能帶來的非預期性後果，日漸為學界所關注（李凡，2006；林尙立，2003；桂勇等，2003；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而此種參與機制的釋放、及其對基層治理機制兩者互塑可能帶來的轉變，會對基層民主帶來何種轉型前景，是符合發展促轉的理論期待，抑或是政權維穩的強化統治根基，仍尚待解答（Gilley, 2004; Nathan, 2003; 吳玉山，1998；耿曙、陳奕伶，2007；2008: 199-201）。就此，「政治功效意識」(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衡量轉型中政權公民參與意識情形，時常被論及的概念。本研究據此出發，嘗試以城市居民選舉參與心態的「政治功效意識」及其導致的政治行動進行探討，並嘗試透過建立具體假說，解釋參與者的心態偏好與行動選擇，以提供一個較佳的分析工具。最終，本文將回顧此種基層選民政治參與意願及政治行動情形，對於治理機制乃至於中國政權發展論辯，將帶來何種影響與轉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觀而言，中國城市基層治理，存在著單位體制渙散後，「社區治理」的迫切需求，透過「居民直選」居委會，甄補政治菁英，填補統治空隙，重拾城市社會控管能力（李凡，2004: 31-35; 陳偉東、李雪萍，2004: 88-90）。此種需求

誘因，提供選舉制度自「非競爭選舉」(non-competitive elections)轉向「半競爭性選舉」(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的後果，而出現了「直接選舉」的實施。<sup>1</sup> 正如 Diamond(1999: 17)所指出的，雖然居委會選舉尚未具備「民主選舉」的要素，但已經由極權體制下國家的選舉絕對控制走向鬆綁的「半開放」型式(Shi, 1999)，這種制度效應，勢必帶來可觀的政治影響。

就此，中國的基層選舉自 2006 年後，上海市的基層「居民委員會」直接選舉達到的選舉規模與擴展區域，更為全國所少見（王邦佐，2003: 106-155; 左志堅，2006; 李凡，2003: 3-25）。進一步而言，城市基層居委會選舉，做為合法制度參與管道，漸為城市居民習慣與接受。就「比較共產主義」(Comparative Communism)的角度，Moshe Lewin(1991)曾謂：「城市是民主的搖籃」。由蘇東共產政權轉型經驗觀察，城市由於經濟水準較高、居民組成多元，民主意識由此發軔。我們據此關照中國城市基層選舉意義，是「有限政治改革」(limited political reforms，徐斯儉，2004: 173-174; 桂勇等，2003: 23; 楊敏，2005)<sup>2</sup> 下的有限選舉參與。而根據政治參與理論，中國的基層「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實仍不脫「動員式選舉」性質(Verba et al., 1978: 46-47)。

事實上，現有城鄉基層選舉的研究成果顯示，中國的基層選舉參與日趨多元，政治意識日漸浮現（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 O'Brien, 2008; O'Brien and Li, 2000: 465-491、2006; Perry and Goldman, 2002）。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基層治理，城市公民欠缺自發，普遍缺乏行政資源，但選舉動員卻得以成功，莫不引起諸多矚目。部分研究認為結構誘因轉化、基層人情網絡機制及選舉學習帶來的示範效果，促成部分參與者的政治意識浮現與參與動機(耿曙、陳奕伶、陳陸輝，

---

<sup>1</sup> 競爭性選舉、半競爭性選舉，與非競爭性選舉的分類標準參見 Hermet (1978: 3-7)。

<sup>2</sup> 類似的看法包括 Andrew Nathan 與 Bruce Gilley 以「韌性的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界定中國政經治理改進(Nathan, 2003; Nathan and Gilley, 2002)。Shi(1999: 1115-1119)、Chen 與 Zhong(2002: 187-197)則對於基層選舉參與觀察到受限的參與情形與「有限競爭性」。

2008: 526-532)。若干研究則關照動員創造社會資本、或仍存在一定物質誘因激勵，乃至傳統黨國動員重塑的諸多可能性(陳偉東、姚亮, 2005; 劉春榮, 2007)。但對於參主要與者個體心態的轉變，及其導致的政治行動的關聯，仍較為欠缺，質言之，當我們在說明作為選舉主要參與者--「選民」的面貌，仍沒有一個整全的圖像。對於選舉研究而言，選民個體在面對選舉制度的制度認知，及選舉誘發的參與心態，對於選舉帶動的後續效應，及為政權帶來發展轉變，影響甚大。而現行的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研究，此塊拼圖仍尚待補足。

研究者並且認為，當前對於選舉參與效應的相關論辯皆有所缺憾，主因在於忽略個體選擇偏好的深層機制。另一方面，對於參與者的退出政治參與及採取政治抗衡的手段，事實上都過度偏向「宏觀的結構面詮釋」，並沒有從微觀（即個體）理性出發，解釋宏觀（即社會）的集體選擇。與之對照，現存關於參與效應的論辯，桂勇（2003）等人提出「推銷民主」的看法，認為基層選舉的高度行政化，為基層社區建設「買單」的作法及動員選舉特性，由於參與者只有三分熱度，終走向參與動機低落的困局。若干學者則寄望「社會資本」會帶給社區「賦權」(empowerment)，激起參與意識，走向認同轉向的抗衡結果（孫立平，2001；劉春榮，2007）。

就此，研究者並不否認上述見解，城市基層選舉最終會走向強化治理機制與政治建設，或是走向社區自主性浮現而抗衡的兩種論辯，是我們要預測的結局，但卻不完全是我們要解釋現狀的「全貌」。根據研究者於2009年的田野調查發現，社區基層選舉參與者的心態，及參與行動，事實上呈現極為混亂多元的狀況，這使我們在理論預設難以完全解釋，必須回歸到微觀，而能解釋個體行動的機制。就此，本研究目的，在於觀察城市公民的「政治功效意識」(political efficacy)，



為對城市公民意識帶來何種轉變。<sup>3</sup> 並據展望此種政治態度，會為公民帶來何種政治行動。非常不同於西方現有的研究，根據個人 2009 年「前期研究」(pilot study) 的觀察，大陸城市居民在參與選舉之後，浮現出兩種性質不同功效意識「次分類」—作者稱為「防禦性」與「認同性」<sup>4</sup>—而這部分的差異，也將帶來完全不同的政治影響。對選舉參與的政治心態進行解釋。現有政治行為研究顯示，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行動，可謂息息相關(吳重禮、湯京平、黃記，1999；陳義彥、陳陸輝，2002)。政治功效意識是蠡測選民參與政治影響力，及政府回應性主觀看法的測量概念。就本研究角度，我們將此詮釋個體在參與「效益」上的心態衡量，而能與具體的政治參與行動產生連結。在選民可能採取的政治行動選擇，我們提出了「退出」(exit)、「呼籲」(voice)、「忠誠」(loyalty)三種手段。<sup>5</sup> 總結上述，這種選舉參與的「效益-行動」分析模型，將使個體選擇更為清晰，我們由此亦較為推斷城市社區群體現象的背後微觀因素。

## 第二節 研究主題：政治功效意識

正如前文揭示，本研究以政治價值變遷角度，觀察城市基層選舉參與帶來的後續政治意義，解釋選民採取可能政治手段的「心理-政治」意向分析。進一步而言，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參與的意願情況，是否會促成了公民在對待選舉的「制度作用」有不同立場？即公民是否能認知到選舉確實能進行政治表達；並相信制度（選舉）能為政治帶來改變，維護自我利益或認同意識？質言之，透過選舉產

---

<sup>3</sup> 本研究所謂「政治功效意識」，乃指個人對自身得以了解、參與政治事務，並獲得政治成員政回應，和能影響多大政治結果的信念（界定參考自吳重禮、湯京平、黃記，1999；陳義彥、陳陸輝，2002）。按 Lane(1959: 149)的定義，政治效能感有兩個成分，一是人民認為自己是有影響力的，另一個則是人民認為政府應該有所回應(Abramson, 1983: 141)。Balch(1974: 24)則依照 Lane 的說法將政治功效意識區分為「內在功效」(internal efficacy)以及「外在功效」(external efficacy)，前者包括個人認知政治事務了解政治過程的程度；後者則是公民認為政治權威對於其試圖影響政策是否會予以回應的程度（轉引自吳重禮、湯京平、黃記，1999：25；陳義彥、陳陸輝，2002）。

<sup>4</sup> 比較具體的界定與說明，請參考本章第 2 節。

<sup>5</sup> 這三項參與行動的原始概念，出自 Albert O. Hirschman(1970)。

生的「政治功效意識」，是否將為城市基層的民主轉型契機，帶來更多的可能？本研究據此展開兩種迥然相異的政治功效意識探討：「防禦性功效意識」與「認同性功效意識」，援引解釋選舉過程的選民參與意願。就本研究角度，我們在此將政治功效意識視為選民衡量進行基層選舉參與，政治影響能力程度的「效益」評估。他事實上涉及了選民對於自身的選舉參與過程，及採取的可能政治行動的「利害計算」。個人的參與動機及回應需求。進一步而言，我們採取**參與動機根源解釋方式**，區分這兩類群體。以下，我們茲說明這兩種類型的差異。

### 一、「防禦性」功效意識

過往中國基層政治參與研究曾顯示，政治功效意識可能是鼓勵選民進行非黨國偏好人選的重要因素（Shi, 1999）。Chen 與 Zhong（2002）則認為，選民的投票行為雖然具有政治服從的特性，卻仍透過選舉過程，選民操作了對政權不滿與公民不服從的異議情況。這種政治參與及投票意願，參與心態卻與黨國服從者極為不同的參與群體，提供了發展防禦性效能感概念的可行性。進一步而言，參與抗議與抗爭活動使個人累積政治知識及經驗，個人通過這類抗爭學習提昇其功效意識有顯著影響，這種出於自保，而產生自我維護及參與意願的情況，將使得其進行投票及政治抗爭的過程，會有更高的政治自信心。我們在此嘗試個人政治參與意願浮現的動機根源進行界定：**「防禦性」功效意識即出於「抵抗黨國」與「保護自身權益」根源的參與意願**。換言之，抵抗性的功效意識來自於自發性的維權需求的「政治過程」，衍生的參與意願，他可能在經過選舉參與後，會有更強的參與動機。

### 二、「認同性」功效意識

觀察現有城市基層選舉參與文獻，若干研究則指出，選舉的黨國佈建特性，對於城市居民的參與心態，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影響（桂勇等，2003；劉春榮，2005；

2007；熊易寒，2008）。耿曙（2008）等人則指出，這種有限政治改革下的動員式參與，仍然將誘發高參與群體的參與動機浮現，及政治功效意識的提升。研究者個人在 2009 年上海市居委會換屆選舉的田野資料，則發現表態黨國支持的參與群體，並非完全受到黨國被動動員，而是在個人參與心態及影響政治的信心程度上，具有一定主觀立場；在選舉過程的參與手段上，也極為熟練。就作者個人觀察，這種心態來自於「群體認同」的滿足展現，黨國透過既有動員及網絡力量，使得原本具有高黨國支持的個體，逐漸融入群體之中，通個體認同群體的多數偏好，及感受到滿足並自覺能影響群體事務，參與自信於焉浮現，這種「認同建構」(identity building)的過程，是黨國支持者參與的主因（劉春榮，2005）。進一步而言，以動機根源界定：「認同性」功效意識來自於「群體意識」與「黨國認同」交錯融入而浮現的參與意願動機。必須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個人認同功效意識的上升，反映的是對執政當局的認同，這種高度認同反映的是黨國支持，黨國是公眾/群體利益的代表者，對於黨國的支持會「極大化」公益的實現。黨國透過儀式性與口號宣傳達到群體認同的效果，但最終也可能信念破產，使個體走向政治失望。

總結上述，「認同性效能感」與「防禦性效能感」反映了公民影響政治認知的動機差異，而我們毋寧可以說是由於「參與自覺」的層次有極大的差別，這將使個體在後續的政治涉入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以下，本篇論文結構共分為五部分，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將檢閱相關文獻，就相關論點進行爬梳，並提出研究假說與研究方法；第三章則透過居委會社區個案的比較分析，驗證本研究假說，並透過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參與抉擇關係，說明不同功效意識可能採取的參與行動；第四章則主要探討選舉過程對選民參與心態及轉變產生的影響，我們在此主要關注兩個情況：

「政治失望」及「高認同性，低防禦性」選民由「忠誠」政治行動走向「退出」

的主因，研究者在此透過 Albert O. Hirschman(1982)的「私人-公眾」轉換參與機制進行解析。第五章為結論，我們將回到第一章涉及的基層治理機制及政權轉型論辯探討，嘗試對基層治理的轉型前景提出預測。



## 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研究設計

在本章，我們首先回顧現行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而主要針對「動員式選舉」及「人情網絡」兩項中國基層選舉特有的性質深究，作者並認為，前述觀點存在「結構制約」的基層選舉發展邏輯，但客觀而言基層選舉的選民自主意願確實日漸浮現（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劉春榮，2007）。其次，我們則對現有的政治功效意識理論爬梳，並關照現行中國基層選舉政治態度的相關探討，發展本研究架構。最後，則提出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及研究方法，進行後續經驗驗證。

### 第一節 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

本研究認為，下列兩類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動員式選舉」及「人情網絡」不與本研究互斥。但作者必須指出，這兩項觀點對於居委會選舉現狀，尤其是個體的參與動機及政治行動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侷限性。進一步而言，過往觀察動員式選舉效應及人際網絡之制約作用，皆不脫黨國動員、行政吸納及強化治理機能的結構侷限立場（耿曙、陳奕伶，2007）。此種結構困境，致使吾人寄望基層選舉轉型之前景，不免難以適從

#### 一、動員式選舉

在本節，我們主要關注動員式選舉參與之於政治參與文獻相關探討，動員式選舉的網絡佈建、資源予奪特性，與支持性的政治效果，廣為所知。過往研究皆認為，政治參與應是一種「自願」行動，而非黨國捲入、群眾組織的由上至下動員(Verba and Nie, 1972; Verba et al., 1978; Weiner, 1971)。Weiner(1971: 164)即強調，

動員式選舉的「強制性動員」(coercive mobilization)與「支持性參與」(support participation)無法顯示出公民參與過程中「有所選擇」的能力，不能與「自願性參與」相提並論。但另一方面，動員式選舉並非極權政體或轉型中國家所獨有，民主國家亦時常所見，以下茲分別爬梳動員式選舉之蘇東模式，次而探討西方選舉動員的政黨機器作用及威權轉型國家經驗，並據此觀察過往中國動員式選舉之特徵，做為比較基礎。

回顧舊有共黨政權的動員式選舉，旨在彰顯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及黨國組織能力(Friedgut, 1979)。就蘇聯經驗觀察，極權主義政體下，選民接受動員，則意在避免體制懲罰(Furtak, 1990: 9-10)。Friedrich 與 Brzezinski(1965)認為極權主義國家下的政治參與，受黨國強控，民眾動員不在表達政治意見，意在表達彌賽亞式政治狂熱。Bahry 與 Silver(1990)觀察到這種「命令式動員」的高投票率帶有政權的合法性假象，在蘇東共黨政權轉型過程中，公民對形式僵化的政治活動早已感到不耐，其動員機制亦已不若過往(Bahry and Silver, 1990; Howard, 2003)。Howard(2003: 122-123)回顧後共黨政權的民主轉型經驗，因此而指出，當動員式選舉夾帶的政治活動過度頻繁，公民的政治參心態不僅日漸消極，政治信任亦受到影響。就政治文化的政治價值變遷的角度，大規模選舉動員經驗，對形塑蘇東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價值，帶來了負面的制約及影響。

另一方面，由西方選舉動員經驗觀之，美國政黨的政治動員是挽救逐年低投票率的解決方法，政黨的「政治機器」(political machine, Grimshaw, 1992)能力與投票率高低呈現正相關(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過往研究認為，美國政黨選舉動員得以成功，主要是皆透過物質性誘因促使選民投票(Wilson, 1973: 54)。但亦有學者指出，選舉動員運作的政治機器與人情網絡，在基層社區型塑了共享價值，甚至提供了選民在選舉過程謀求集體權力的機會(Browning et al., 1984、

1990; Guterbock, 1980: 206-207)。<sup>6</sup> Rosenstone 與 Hansen(1993: 23-30、173-174) 因此認為政黨人際網絡下的動員參與，能夠降低網絡訊息成本，透過人情關係，重塑選民政治認同，化解政治疏離感(Verba et al., 1995: 269)。

Huntington 與 Nelson(1989)則從開發中國家威權轉型經驗觀察，透過選舉參與的組織、學習或利益誘因的動員選舉過程，仍可逐漸內化選民產生「自願性參與」。Diamond(1999: 16-25)亦指出，在十九世紀以來步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各國，都是透過「有限選舉」的持續擴張，逐步轉化「侵蝕」(erode)選民的威權體制服從。綜合上述，動員式選舉提供的政治學習、人際網絡，與政治資源，仍提供充分的參與誘因，及形塑選民對選舉之制度信任、認同之可能性。共黨政權的「命令式動員」經驗，若是通過動員網絡轉化與選舉的教育示範，其參與經驗亦不無產生自主意識之可能。<sup>7</sup>

據此關照，過往中國基層選舉的經驗。基層政治組織與選舉扮演了類似單位制的政治控制與社會整合角色，「大會戰式」的毛式選舉動員是主要的選舉要角(Schurmann, 1968; Townsend, 1967)。Burns(1988)將此界定為「動員式參與」(mobilized participation)，指出其透過組織手段與利益誘因進行動員；但另一方面，透過農村選舉的經驗觀察，農民事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願性(Burns, 1988: 1-11)。Falkenheim(1987)亦指出基層不同群體亦因為共同利益，出現了不同政治表達。

客觀而言，根據政治參與理論，當前中國基層的選舉參與，仍不脫「動員式選舉」性質(Verba, Nie, and Kim, 1978: 46-47)。關照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現狀，換

---

<sup>6</sup> 美國政黨選舉動員過程，除了過往指出的物質餽贈或賄賂等負面見解外，亦有學者指出，社區基層政治機器透過與基層選民的互動，也贏得了選民的信任與支持，Guterbock(1980: 7-8)稱之為「感情交換」(affectual exchange)，這種友誼性的象徵性支持，強化了社區集體認同。此外，Browning 等人則透過少數族裔政治參與團體的觀察，發覺政黨菁英必須在基層選舉動員過程與社會次級團體進行結盟，而稱此為「政治團結」(political incorporation, Browning et al., 1984)。

<sup>7</sup> Shi(1999)對中國大陸選舉參與的觀察呼應了此種看法，他認為選民只要透過舉辦選舉的制度性參與，就能達到政治意識的改變。

屆選舉由城市基礎組成單元「社區」其相應的行政組織「居委會」展開，Read(2003b: 27-29)就城市基層「社區建設」的需求，及中國傳統群眾運動背景而提出「地方自願主義」(local volunteerism)概念，換言之，過往城市單位工作經驗，往往必須伴隨著大量政治動員與意識形態宣傳，這種政治學習與政治工作的經驗，使得傳統中國的企業組織與權力模式，呈現一定程度的「政治化」情形(Schurmann, 1968; Walder, 1988)。<sup>8</sup> 對於中國基層選舉的動員需求，國家在於找回傳統黨員的政治基礎，激發參與意願。但這種依賴「老黨員、老革命」的方式，隨著社區逐漸年輕化、及「單位制」社區面臨劇變的情形，逐漸難以應付動員需求。進一步而言，當中國基層選舉走向逐步開放，傳統動員式選舉的政治學習、人際網絡或利益誘因等結構性條件，勢必面臨轉化。此外，對於「新興社區」、高白領、高經濟所得組成的商品房，「地方自願主義」並無法解釋個體的投票動機，新興社區欠缺動員選舉所需要的必要條件。顯然動員式選舉並無法涵蓋解釋任一個案，對於促成選民進行政治行動的動機，動員選舉無法扮演關鍵因素。

## 二、人情網絡

如同在動員式選舉一節的文獻回顧，我們發現在中國案例，其所具備的黨國組織及政治資源，時至今日，均已不若過往。據此關照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相關文獻，不難發現：社區居民普遍欠缺自發，基層管理體制渙散，存在一定的政治冷漠（桂勇等，2003; 耿曙、陳奕伶，2007: 97-99; 陳映男，2005）。其次，黨國難以命令，經濟帶動社區意識與網絡促轉，傳統動員機制早已無法深入，社區自主意識日漸浮現（李凡，2004: 29-31）。進一步而言，社區居民的政治異議及公民意見表達，已日漸多元自主，更有意願進行政治抵抗（耿曙、陳奕伶、陳陸輝，

---

<sup>8</sup> 這種單位工作經驗轉嫁到社區需求，事實上有其客觀的「市場轉型」基礎。如上海 90 年代國有企業改革造成大批早退與下崗工人，結果就是把這批工人轉移成社區工作的居委會幹部及主要的動員群眾群體，而解決失業問題。上海政壇對於這類幹部的背景有個專有詞彙，叫做「黃菊幹部」。訪談案例 3、4。



2008; 楊敏, 2007: 137-164)。<sup>9</sup> 但另一方面, 現行黨國主導的動員式選舉參與, 卻又保持一定作用, 維持「高投票、高得票」<sup>10</sup>的雙過半保證, 社區基層選舉何以成功, 不免啓人疑竇。

就此, 若干文獻揭示, 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政治參與, 存在對於參與者與被動員者的情感互惠關係, Read(2003b)稱此為「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根據前些年的初步調查發現, 城市基層的選舉動員模式, 主要透過「兩級傳播」(two-step flow communication), 社區積極分子組成的「行政網絡」進行傳遞訊息的角色, 達到高參與的結果(邱崇原, 2007: 103-104; 桂勇, 2007:108; 耿曙、陳奕伶、陳陸輝, 2008: 520-522)。<sup>11</sup> 劉嘉薇(2006: 21)則將此形容為「兩步-人情」式的動員。質言之, 選舉動員網絡的結構轉化, 促成群體認同意識的浮現。透過社區集體的形式, 強化了公共利益與「我群意識」(we-group/we-head)。而經過選舉工作的密切互動, 產生了「強網絡」的鄰里關係, 塑造新的信任網絡基礎(徐勇, 2004; 楊敏, 2005; 劉春榮, 2005、2007)。

另一方面, 過去研究顯示, 中國人情的義務動員, 主要受華人社會人際互動的人情、面子與關係所影響(黃光國, 1988)。按照社會網絡觀點, Granovetter(1985)指出個人資訊的接收與行動受嵌入性的網絡(Embeddedness Network)制約, 邊燕杰(1997)的研究則顯示, 華人社會的資源調配依循互動緊密的「強關係」(Strong Ties)。Jacobs(1979)指出, 中國政治的互動模式, 深植於既有的關係基礎。孫立平、郭於華(2000)同時觀察到基層治理, 「軟硬兼施」的正式權力的依賴非正式

---

<sup>9</sup> 研究者於 2009 年上海田調經驗發現, 居委會選舉過程常是社區異議人士表達政治不滿與政治訴求的「表演場域」。由於換屆過程上層機構必然會全程監督, 異議人士便會趁此「砸場鬧事」。楊敏(2007: 137-164)將此類維權、抗議式的參與稱為「權益性參與」, 他意味著各種日常事件中所蘊釀的壓力, 都可能透過選舉所開放的管道表達抗議。

<sup>10</sup> 「雙過半」意指「社區登記選民必須過半, 當選者得票率要過合格選民的一半」的選舉程序要求。除了選舉的程序性要求, 基層黨政機構還必須滿足黨組規劃人選當選的「潛規則」條件, 這對日常行政過程欠缺社區群眾互動基礎的黨政機構, 是極為艱鉅的任務。

<sup>11</sup> 類似發現有劉春榮(2006)的「關鍵群眾」(critical mass), 桂勇等(2003)的「積極分子」, 這種網絡承擔基層治理運作與選舉參與的中堅角色。

關係狀況。就此，選舉動員時「行政網絡」的串門遊說，化解疏離，彌合網絡，連綴(reach out)社區關係網絡化；而人情關係的非正式地位(informal status)，脫離正式關係，凸出人情、鄰里關係，使得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運作人情化(劉春榮，2005：134-136；2007：60-79)。「社區網絡」根植的人情關係、鄰里基礎，在動員式選舉過程充滿重要性(桂勇，2007)。

總結上述，本研究並不否定上述觀點，正如現有觀察顯示，社區基層選舉的動員性質及人情網絡正逐漸面臨轉化，而漸為密不可分。但作者必須指出，若選舉參與者存在主觀參與意願，則「面子」問題、「鄰里關係」並無法強迫個人的投票意願。人情網絡的觀點事實上背後有極大預設，那就是「**選民認為自身選票價值極低**」，才會願意買帳。誠然，正如台灣地方自治早期經驗顯示，選舉動員的綁樁賄選，是建立在選民認為選票的價值低於金錢的價值。但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客觀而言只涉及「情感互惠」，且基層黨國資源普遍欠缺。<sup>12</sup> 當個體認為自己的選票是有用的，則人情作用效果影響投票意願的意願作用就不再這麼強。一個例證是，對於基層社區的反抗群體，面子無法其投票意願。另一方面，一個鄰里關係社會資本的建立不單需依賴黨國，有時來自反抗議題的塑造及抗議群體的網絡構築，我們會在第四章透過社區個案進一步探討。

## 第二節 理論對話：政治功效意識

在本節，我們首先嘗試探討政治功效意識對於轉型中國家政治參與帶來的政治意義，據此對照現今中國政治參與文獻進行鋪陳。再來，我們爬梳基層選舉可能帶動的「制度效應」，嘗試以政治功效意識觀點與之互詰。最後，我們主要探

---

<sup>12</sup> 事實上可以從上海的田野經驗觀察到，即便是處於市區核心地帶、高所得、稅收豐富的區域，基層治理單位的上層機構：「區政府」、「街道辦事處」，也沒有意願投入太多資源，關鍵在於投入這類基層單位沒辦法「創收」。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居委會在面臨此種困境，必須主動去找議題、創造居民資源投入、帶動整個基層參與達到治理績效。見邱崇原（2006）、訪談案例 18、27。

討政治功效意識的根源，與現有中國基層政治參與文獻進行對照，並提出「政權支持」概念，說明選民自主意願浮現的主因。

### (一) 政治功效意識、選舉參與及中國政治參與轉型基礎

就比較政治的研究基礎，在一個政治體系，公民政治態度的分佈及強度該體系穩定程度息息相關，其中政治功效意識提供了政治體系合法性的統治基礎(Almond and Verba, 1963; Easton, 1975、1979; Easton and Dennis, 1969)。在 Almond 與 Verba(1963)探討「公民文化」(Civil Culture)的跨國比較性分析中，說明了政治功效意識對於國家公民文化組成具有重大影響，更點出政治功效意識受到政治體系對於公民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程度所決定的重要意涵(Craig, 1979: 229; Lane, 1959: 149)。因此，當公民相信政府能夠對其政治態度產生回應，並且能透過政治涉入展現其政治能力，對於政權性質及該國政治文化的塑造，都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

此外，Campbell(1954、1960)等人的研究指出，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投票參與密切相關，投票參與的政治涉入對於提升政治功效意識，相較於其他政治行為更為顯著。Finkel(1985: 891-913、1987: 441-464)則透過西德、美國選舉的貫時性研究發現「競選活動參與」(campaign activities)相較於單純的投票(voting)行為，不僅提高選民政治能力，其政治功效意識變化則更為顯著。換言之，當競選活動的參與者透過選舉活動推行的開展，而對於選舉制度的熟悉和實際操作，則對於政治影響力更具信心。我們據此關照 Diamond(1999)的「有限選舉民主論」(limited elections democracy)的觀點，當選舉自「非競爭選舉」轉向半開放，是否仍然提供上述選舉提高政治學習、政治能力及功效意識變化的理論假設？而中國的選舉參與情況，又是反足以擺脫既有結構侷限，及共黨政權大規模動員下選民政治冷漠遺產，而出現政治能力提升及功效意識的浮現？

根據上述問題意識，中國自 1980 年代後步入市場轉型過程，不同政治次級團體因為共同利益，出現不同政治表達，意識形態作用亦因為市場因素，逐漸稀釋(Chen, 2004; Falkenheim, 1987; Lynch, 1999)。基層選舉參與的命令式動員正逐漸出現轉化，選民利用參與來追求利益，為體制所允許的政治行為正漸與個人逐利心態調適，積極參與政治的程度與多樣性已比想像中高(Chen, 2004; Shi, 1997)。Shi(1999)的研究更顯示，政治功效意識可能是鼓勵選民進行非黨國偏好人選的重要因素。Chen 與 Zhong(2002)更認為，選民的投票行為雖然具有政治服從的特性，卻仍透過選舉過程，出現對政權不滿與公民不服從的異議情況。進一步而言，就選舉本身帶來的「制度效應」，即便選舉競爭模式仍充滿制度侷限，投票的行為者依然能夠抓緊政府鬆綁的機會，而表達政治利益，出現個人成本效益的計算。

## (二)「選舉」的制度效應

就此，選舉提供的制度誘因，對於轉型中政權的政治參與究竟能扮演何種角色？現行研究顯示，黨國高度主導的選舉模式極易轉型後留下不良後果。另一方面，東亞經驗顯示，基層選舉的開放及人情網絡乃至於東亞文化的價值傳承，不完全具有負面意涵(Diamond, 1999; Nathan, 2003)。<sup>13</sup> 研究者認為，當前中國城市基層參與的浮現的自主發軔、參與意願，一定程度反映城市參與網絡與公民意識的浮現，促成了公民自我表態的政治行為，而服膺了現代化理論相關典範的經典解釋(Dahl, 1961; Deutsch et al., 1956: 9-10; Lipset, 1981; Huntington, 1985)。這種非正式關係的人際網絡的間接性動員型式，與投票成本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降低選舉成本假設相符(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Downs(1957)指出，理性的個人會計算其參與投票的成本效益分析，如參與成本大於回報時，選民傾向不行動；反之，若選民可從中得到「淨效益」(net benefit)，

---

<sup>13</sup> 對於東亞文化不適合民主著名論述的可參見香港總督彭定康與新家坡資政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爭論(李明輝, 2001)。再來從台灣、南韓乃至於日本的經驗可以發現，基層地方網絡及反對勢力的結合，事實上有助於政權的民主化進程(Diamond et al., 1997)。

則會參與投票。當選舉的成本降低與「淨效益」提高，中國城市基層的社區居民，將會更有意願，利用手中的選票，表達個人利益與公眾需求，而出現與過往不同的政治涉入，及政治參與的態度轉換。

### (三) 現有研究的啓示：政治功效意識的根源

個體在面臨選舉此項制度規則時，政治功效意識不可能憑空而生。就此，Li(2011)從跨省的農村經驗調查顯示，當村民「不信任現任政府官員」時，會有強烈領導層輪替需求，由此會有較高的普選意願。Li(2011)由此推論出一套「運作機制」，當公民能透過現存參與管道（選舉）進行系統性的變革，便能將原本主觀意願轉為實際的政治偏好與政治行動。另一方面，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則對選民的普選意願，主要是基層行政機構（如縣政府、村委會）有顯著相關(Li, 2011: 300-303)。這顯示出了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對於選民的參選意願與實際政治行動，對於政治當局的不信任會間接影響。Chen(2004)從城市居民政治態度調查指出，居民對於特定執政當局（如市政府、基層單位）的「政治支持」<sup>14</sup> (political support)會受到官員貪汙、經濟表現等變數所影響；再對於共黨政權政治支持的情形，則沒有顯著變化。進一步而言，當執政當局表現不佳，這種情況是否會進一步危及政權不穩？又是否會對政治功效意識的轉變產生關鍵性的作用。

就此，Diamond(1999b)發展中民主國家如何朝向民主鞏固的過程中，「政權支持」(regime support)成爲逐漸被重視的概念，而成爲理解政權合法性程度的重指標。黎安友則透過跨國研究計畫《東亞晴雨表：民主化和價值觀變化的比較調查》的個案比較，將「政權支持」的概念，納入東亞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探討，並將文化價值特有性，認爲是影響政權支持極爲重要的變項(Nathan, 2007)。而政權

---

<sup>14</sup> 這項概念出自 Easton(1975)，Easton(1975)並進一步將政治支持區分爲「普遍的政治支持」(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與「特定的政治支持」(specific political support)，但在經驗研究上較不易區分。而就普遍性的政治支持，則應該具備信任(trust)及合法性(legitimacy)兩個面向；後者則涉及特定執政當局的政治表現。另一個類似概念「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則視爲與政治支持難以區分，而被視爲探討政治體系與制度穩定性的核心範疇(陳陸輝，2002、2003)。

支持的概念事實上極為類似 Easton(1975)所提及的「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反映了政治體系的輸入面情形。就此而言，政權支持與政治功效意識兩者間關聯，完整呈現了政治體系的輸入面與輸出面，拼湊出了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圖像。

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以「政權支持」作為解釋選民政治功效意識的背後動機，作者認為，對於執政當局的支持程度會影響個體「認同性」與「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高低變化，我們將於下節進一步說明。

### 第三節 研究設計

####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行為研究「心理-政治研究途徑」(psycho-political approach)的分析邏輯，提出研究假設：經過選舉過程，兩種「政治功效意識」兩種的歧異性(自變項)會轉變成不同「政治行動」(依變項)。簡言之，個體政治行動的「退出」、「呼籲」、「忠誠」選擇，受到不同功效意識的情況所影響。研究架構如(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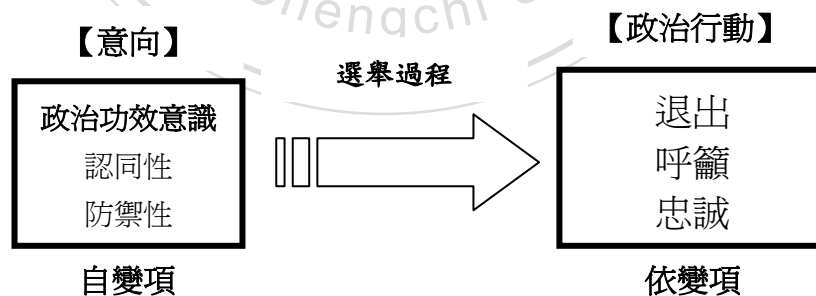


圖 2-1 研究架構圖

其次，我們將動員式選舉及人情網絡作為本研究的「對立假說」(alternative

hypothesis)：「選舉動員」、「人情網絡」，我們將於第三章的社區個案比較，驗證這兩個對立假說是否還解釋城市基層選舉的現狀，進一步而言，本研究並不否認上述「對立假說」的部分解釋性。最後，我們將個體的「政權支持」程度作為「前置變項」(Antecedent Variables)，研究者認為政權支持情形，會影響個體的功效意識變化。進一步而言，若個人的政權支持程度高，由於黨國支持根源，會衍生「高認同性」功效意識，且「無法」衍生出「高防禦性」功效意識；若個人的政權支持程度低，由於反抗性立場，會衍生「高防禦性」功效意識，且「無法」衍生出「高認同性」功效意識。在此，我們主要將兩種功效意識：「防禦性」與「認同性」設定作二元變項(binary variable)操作，分別存在「高」與「低」兩種狀況，個體在功效意識配對上，會形成兩兩組合的四種效能排列分布，**個人可能存在兩種功效意識**，因為他可能經歷過反抗參與或認同建構的過程，但由於個人先天上政權支持的影響，使得他會與某種參與過程較為投契，而衍生出某一類較高的功效意識。舉例來說，一個選民，他可能經歷過或參與黨國認同的選舉參與過程，但由於他的反抗黨國心態，則他只會較低的「認同性」功效意識，反之他可能透過反抗參與過程，得到較強的「防禦性」功效意識。

進一步而言，我們並納入「政權支持」變項。因此對於一個選民，可能同時存在兩種政治功效意識，但由於個人政權支持程度影響，不可能同時存在「雙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高、防禦性功效意識-高」的狀況；反之，若選舉並未帶動選民的參與意願，呈現「雙低」的情形，則顯示「政權支持」並未產生影響，故選民形同「不入」政治。在「雙低」的情況，事實上我們能說政權支持與兩種功效意識間呈現「非線性」的關係，簡單來說，他**沒有較高的參與意願，且對政權支持沒有特定好惡**。反之對於一個對於政權支持有所好惡的個體，他的政權支持程度必然會與一種功效意識呈現「正相關」情形。

總結上述，本研究認為，對於個人而言，他的政權支持程度會與「防禦性」或「認同性」功效意識一種有「正相關」的關係，這是由於選舉帶動的學習效果。但對於政權支持「無反應」的個體，功效意識也不會出現變化，類似「政治冷漠」，此時選舉的制度作用對他來說近似於零。高的「防禦性」與高的「認同性」功效意識，因為兩者只有一種會與政權支持產生「正相關」，此時另一則為「負相關」。我們將政權支持程度與政治功效意識比較配對見（表 2-1）。

表 2-1 政權支持程度與政治功效意識的比較配對

政權支持 程度	高防禦性	高防禦性	低防禦性	低認同性
	高認同性	低認同性	高認同性	低防禦性
高	X (理論互斥)	X (理論互斥)	O	O (不入政治)
低	X (理論互斥)	O	X (理論互斥)	O (不入政治)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我們可以觀察到，社區選民個別的政治功效意識，大致可能呈現三種分布狀態：1.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2. 「高防禦性，低認同性」。3. 「低認同性，低防禦性」。進一步而言，我們可將此視為選民由於政權支持程度，導致的兩種功效意識的「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當一方功效意識先天壓過另一方時，個體將以該功效意識作為優先的衡量。上述三類排列分布，涵蓋了個體所有可能會出現的功效意識分布情況，在推論個體面臨選舉制度效應，反饋的政治行動上，更具可預測性及解釋的邏輯(the logic of explanation)。以下，我們將這些排列分布，可能會出現的政治行動進行預測，並據此提出四個「研究假說」



(hypothesis)，如下（分類圖見圖2-2）：

**研究假說1：「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經過選舉過程，會進行政治呼籲(Voice)。**

「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選民，由於選舉過程無法滿足個別權益的需求，會走向政治呼籲(voice)，這種呼籲可能包括了體制內的政治抗爭，甚至是體制外的過激行爲。我們預設的是，個體認爲個別利益維護的迫切需求，**選舉本身的制度作用必然完全無法滿足**，這使得個體必然走上激烈的政治行動，以喚起當局關注。

**研究假說2：「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若選舉過程達到滿足，會表態政治忠誠(Loyalty)。**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若選舉過程能夠滿足其訴求，則會對黨國表態忠誠。出於對黨國的高認同性，在此我們可以發現「選舉動員」、「人情網絡」變項會對其產生作用。換言之，情感性與話語體系作用使得選舉帶動的政治資源分配需求尚未在其出現，故較易得到滿足的情況。

**研究假說3：「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若對選舉過程產生「失落」，則退出政治(Exit)。**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若浮現政治「失落」，則會退出政治(exit)。在此我們預設的是，選舉被個體視爲政治支持與公眾利益表達的制度管道，若條件無法滿足，則會退出政治。對於高黨國支持的參與者，當黨國原

本理想性的政治訴求將被選民轉化實際的政治資本，個體難以報持期待，這反映了某種轉化機制的浮現。進一步而言，此種政治失望可能累積成爲不滿，爲下一步的「過激行動」奠基。

**研究假說3：**「低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經過選舉過程，仍不入政治(Exit)。

「認同性低，防禦性低」功效意識選民，對於政權支持程度變項是「無反應」或是「中立」，對於現狀應沒有強烈的改變意願，由於不存在參與動機，因此功效意識低落，而不入政治(exit)。進一步而言，這種情況出現對於政治沒有強烈好惡、或是欠缺政治參與的學習機會，「選舉動員」及「人情網絡」會對其產生作用。一般而言，這類參與群體，先天存在高度的政治疏離(alienated)。

政治功效意識		認同性	
		高	低
防禦性	高	X	高防禦性，低認同性 <b>政治呼籲(Voice, 1)</b>
	低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 <b>(達標)政治忠誠(Loyalty, 2)</b> <b>(失落)退出政治(Exit, 3)(選後)</b>	低認同性，低防禦性 <b>不入政治(Exit, 4)(從頭)</b>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圖 2-2 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分類模組**

## 二、研究方法

### (一) 場域選擇：上大海地區

本研究以大上海地區的社區居委會做研究場域，並進行田野調查。過往研究指出，上海雖是大陸經濟最發達都市，社區組成雖較為多元開放，卻也是國家能力與行政導向最為凸出的案例（陳偉東、李雪萍，2004: 93-107; 耿曙、陳奕伶，2007; Peng, 2001）。耿曙、陳奕伶與陳陸輝（2008: 516）亦指出，上海或能扮演一「關鍵案例」(critical case, Eckstein, 1975: 85、1992: 124; Gerring, 2001: 219-221)。

<sup>15</sup> 本研究以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浮現將導致不同政治行動，予以確認居委會選舉將出現的非預期性後果，而將上海做為現有研究基礎上的「理論確認型」案例研究(theory-confirming case, Lijphart, 1971: 691-693)。此外，上海歷經 2003 年、2006 年及 2009 年三年一次的換屆選舉，至 2006 年擴大居委會選舉直選範圍達到約 55%的覆蓋面，是中共建政後基層直選的最大規模(左志堅，2006; 敬義嘉、劉春榮，2007: 135-136)，按研究者個人田野訪談經驗，2009 年直選規模更已達到 80%。<sup>16</sup> 因此，此種大規模動員選舉動員產生的後續政治效應，頗值吾人深究。

另一方面，研究者於 2009 年 7 月、8 月參加由政治大學陳陸輝教授主持的城市基層選舉與治理研究團隊，進行過上海居委會選舉的「期前調查」(pilot study)，並已發表初步研究成果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舉辦的「基層民主與兩岸關係」研討會，該團隊透過長期跟蹤研究具備可觀研究經驗與田野資料，2010 年 7、8 月將協同上海財經大學耿曙教授、上海大學劉玉照教授，觀察 2009 年上海居委會換屆選舉後，政治參與意識及治理網絡出現的轉化情況。進一步而言，由於具

---

<sup>15</sup> Gerring(2001:219-221)指出，關鍵案例可分為「典範案例」(paradigm case)與「偏差案例」(deviant case)兩類，而偏差案例又可分為「最不可能發生案例」(least-likely case；最不可能符合理論推論卻符合之案例)，及「最可能發生案例」(most-likely case；最似符合理論卻不符之案例)。就本研究因果推論，上海基層選舉的選舉動員、人情網絡情況，若仍浮現自主參與意願之政治功效意識則為本研究的「最不可能發生案例」。

<sup>16</sup> 訪談案例 1、18。

備長期參訪觀察，研究者或能嘗試透過定群追蹤研究(panel study)，觀察個別社區群體，不同時序的政治態度轉變情形，避免「選擇偏差」(selection bias, King, Keohane and Verba, 2001: 129-137)的可能性。就「比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Method)的角度，本研究符合在非隨機少樣本的情形下，有意識挑選(intentional selection)因果關係同質性個案(社區)的研究策略(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而由於採取質性的訪談方法，並未針對母體作隨機抽樣，爲了克服過度推論的問題，本研究於第三章針對社區的類型挑選代表性個案進行比較分類，以避免「便利抽樣」所造成的選擇偏差。

## (二) 研究方法：三種資料蒐集途徑的結合

本研究將於大上海地區，針對社區居委會近實地田野調查。在研究方法上，透過結合「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以及「半結構式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三種研究方法，針對城市社區居民及居委會相關人士進行訪談。

本研究所欲觀察「防禦性」、「認同性」的政治功效意識，惟有先透過實地參與觀察、融入當地基層社群網絡，方能夠進行測量與關照。因此，在進一步研究實際執行上，首先必須就各社區的環境背景進行了解，搜集相關選舉流程、選舉方式等資料，以利後續訪談工作能切合受訪者認知；受訪者首先並需要包括居委會幹部、實地基層政治網絡人員、社區民眾等訪談對象，了解整體環境。下一步則將 1.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2. 「高防禦性，低認同性」。3. 「低認同性，低防禦性」三類群體分別進行區分，並針對政治意識已浮現的個別案例進行深入二次訪談，觀察通過選舉參與過程，及其後續政治行動。

進一步而言，我們在訪談內容上，必須關注到：第一部分、受訪者身分背景，

於選舉動員網絡扮演何種角色，是否於選舉中有實際參與。第二部分、參與過程中，對於黨國抱持何種態度，對於政權支持的情形為何？第三部分、蠡測政治功效意識，並設計訪談問卷，主要透過受訪者進行選舉參與的政治過程及後續的政治行動進行測量(訪談問卷參見附錄二)。

在資料蒐集上，本研究秉持質性研究的「飽和原則」，亦即持續搜尋直到窮盡現象為止。作者於 2009、2010 年共累積了五十多筆的訪談資料，走訪大上海地區七個居委會，針對居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以及社區中的積極份子和一般民眾進行訪談。此外亦訪問街道辦事處、以及區民政局的官員。



### 第三章 觀察驗證：居民選舉參與的效益與行動分析

本章將就居委會選舉選民的參與心態與行動進行觀察。本研究認為，選民的不同政治功效意識對於選民的政治行動抉擇產生了**關鍵影響**。且相較「選舉動員」、「人情網絡」兩個因素的作用來得更強。以下在第一節，我們首先說明中國城市基層自治組織「居委會」的行政結構，與整個基層居委會選舉的選舉過程。第二節，我們透過社區個案比較的方式，嘗試排除本研究兩個「對立假設」，並驗證研究假說。在第三節，我們觀察功效意識提昇的參與選民，通過選舉過程，又會如何採取的政治行動，並說明政治行動的具體特徵及內在心態轉化過程。

#### 第一節 城市基層自治組織-「居委會」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觀察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可能帶動的參與效應，就此「居民委員會」做為城市基層的正式自治組織，有其重要意義。中共自 1990 年代以後，居委會的換屆直選已由局部的區域性試點，轉為大規模的開放。另一方面，由官方主導的選舉過程以及帶動的動員參與，勢必使得居委會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中介點」，極有可能會國家與社會兩者帶來無法預料的轉變。以下，我們首先討論中國城市基層治理機制中，居委會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再來我們則說明居委會選舉過程，及誰是社區選舉過程主要的參與者，還有中共做為威權政體，黨國究竟是透過何種選舉的動員模式來帶動選民參與。

##### 一、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圖像

從 1980 年 1 月 19 日，中國人大重新頒布 1954 年即公佈的《城市居民委員會

組織條例》，到 1989 年人大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王邦佐，2003：111）。但儘管具有法源依據，城市居委會邁向居民直選的過程，卻相對緩慢，直至 2000 年後方被執政當局重視。箇中主因在於，城市人口的快速流動、都市化的急遽增長與經社變遷，使得中共政權必須在基層政權重新構築新的建制權力。就此，李凡（2004：29-30）甚至指出中共加速城市基層治理的主因是由於「法輪功事件」。當 1999 年法輪功包圍中南海向中央示威的「集體散步」事件，使中共警覺到城市基層組織管理出現了極大漏洞，而有強化城市基層監管能力的必要性。事實上，中共在城市落實的自治與改革模式，多數承襲自 1980 年代後的農村改革經驗，透過農村經驗的複製，中共逐步透過基層行政組織的建立，以及城市社區「自治化」過程的推動，找回自己的控管力量。因此可說是農村居委會的選舉開放意義相同，當更多人參與基層選舉、投入基層工作，執政當局不僅可減少治理成本，更能強化合法性。進一步而言，在城市基層自治組織的發展意義上，我們仍可視為由於社會轉型過程出現的「統治中空」，必須透過社會資源的「甄補吸納」強化國家能力(Mann, 1988; 1993)。

若我們回顧居委會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這是極為緩慢的轉變過程。最初，中共在建政初期的整個從農村到城市接管過程中，居委會作為了整個治理組織的末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ao(2004: 129-140)以中國在華南城市區域接管經驗說明了，居委會事實上在人口控制（計畫生育）、戰時動員與城市保防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對於原本具有「外來者」身分的共黨幹部，在居委會的任職可說是共黨基層政權逐漸融入「地方化」的表現。<sup>17</sup> 雖然在 1950 年代後，隨著中共的經濟體制邁入「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階段，城市成為經濟資源集中與

---

<sup>17</sup> 對於在建政之前以「華北區域」、「農村抗日邊區」為根據地的中共而言，基層居委會組織最初的出現，是極具地方特殊性的產物。以最早出現居委會組織的杭州市為例，中共初期的城市接管政策，是透過大量華北地區的黨員進入江南都會地帶，從上到下接管整個城市政府機關，並使黨支機構滲透自城市基層。而當時居委會的組織運作，日常工作是仰賴占這批黨員幹部配偶的「新城市居民」--傳統的「農村婦女」，進行動員。故被當地都市人戲稱為「山東大媽」、「小腳偵察兵」(Guo, 2004)。

國有企業發展的火車頭而有所改變。因為在此階段，原本的都市人轉為依附工廠「單位人」，整個城市社區急遽轉變由單位配給生活需求、依賴國家分配的「單位制」，成為城市治理的主要管理基礎。居委會逐漸淪為管理城市勞動力之外剩餘人口的基層組織，而日漸邊緣化。但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卻又由於國家逐漸讓位管控市場能力與勞動人口的資源分配，城市回復為以私營經濟為主的面貌，城市在面臨人口無法管制的新困境時，勢必必須找回原有的功能。進一步而言，當城市居民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脫鉤時，國家對於市民的社會管控已無法透過去經濟的單位制所掌控，惟有透過傳統基層社區組織的「找回重建」，在既有的基礎上改革。

而 80 年代後，社經鉅變最明顯的影響，在於「新興社區」的出現，城市的土地產權逐漸「市場化」、「私人化」，透過土地的買賣，新興的「商品房社區」逐漸出現。以本研究的田野場域的大上海地區為例，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即由於國有企業的產權集中，使得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在 90 年代後，中共透過國有企業改革、土地產權市場化、招商引資等方式，使區域經濟成長率逐漸攀升。就此，上海市的社區面貌可說極為複雜，「單位社區」與「商品房社區」交錯並存，這使得整個城市行政管理體系重建過程更形複雜，而上述情況亦非上海所獨有。

面對此種治理困境，我們大致可將中共的治理策略與制度建立的方向視作「行政覆蓋」與「自治導向」兩種制度特色（陳偉東、李雪萍，2004：92-105；耿曙、陳奕伶，2007）。行政覆蓋可視作城市透過資源投入建立完善地方與基層的職能，深入行政末梢；自治導向則為強調重新釐清政府與社區的權責負擔，藉由「權隨責走、費隨事轉」。<sup>18</sup> 但事實上，這兩種制度意涵，仍不脫強化行政

<sup>18</sup> 意指上級政府不能將事務任意的下放到居委會，必須經由有關單位的協調，並確認權責範圍；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必須提供經費讓居委會有足夠資源落實政務。



能力，以及達到「完善社區建設」的最初本意。客觀而論，居委會組織的「自治」至多談的上是「讓利」，而非真正的「讓居民自治」。就此，居委會扮演著國家與社會間的中介角色，也因此被賦予「自治組織」的型態，相對而言，則是黨國對於居委會缺乏強制的力量。居委會模糊的角色定位，使得國家和居委會即便有行政業務上的附屬關係，國家對居委會並沒有太多的強制權力。這種情況，使得地方、城市基層官僚人員，在真正面對政策落實的施行面時，時常「走兩步、退三步」，不願投入更多資源、更不願賦予相對的權責，居委會組織對於上層行政組織形同雞肋，基層的社區組織幹部在面對此種資源困境，與龐雜的日常行政事務，勢必只能吸納基層的社區資源、並透過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強化行政效能。

這種資源與制度困境，在大上海地區卻是日漸不復見，1990年代後，上海市政府透過整個管理重心的下移及財政資源的挹注，使得上海市的居委會組織模式走向「高度行政化」的後果。就此，現行法規規定，上海市將居委會納入行政體系架構，建立「兩級政府（區、街道辦）、三級管理（區、街道辦、居委會）、四級網絡（市、區、街道辦、居委會）」。強化街道辦的行政權力，使之由原來區政府的派出機構，成為區政府的下屬行政層級，提升街道辦與區政府之間的溝通能力，以及對所轄居委會的管理功能。而2005年中共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昭示城市社區民主建設的重要性，但實際運作卻展露國家重建基層社區管理的控制意圖（李凡，2004：33）。換言之，社區中的權力結構，在中共「以黨領政」下，黨書記的領導權力高於居委會主任，並通過對居委會事務的決策，以及直接選舉的全權掌控，發揮黨組織在基層社會的影響力。整體而言，居委會組織透過社區黨支部的建立及上層街道辦能力的強化，呈現雙重領導的情形，國家於基層的建制能力趨於強化。

此外，城市基層治理現象的另一大特色是城市業主委員會的興起，業主委員

會是城市基層新興自治組織，這項自治組織的法源依據是由於新興的「商品房社區」出現的結果，透過建商與居民的新建房買賣過程，部分城市市民成為擁有土地產權的「業主」，在社區公共環境與建物維護的需求基礎下，成立業主委員會進行自治管理，並招聘社區整體環境維護的「物業公司」，處理社區環境的公共事務。因此，其組織重點在於維持業主的權益所設立，而維護業主權益除體現在社區選舉外及社區居委會的溝通等正式管道外，亦透過非正式管道的維權行動捍衛權益，這使得業主維權行動的興起，成為城市社區圖像的一大特色。進一步來說，對於社區居委會而言，業主委員會的存在以及兩者間角色的部分重疊，使得居委會在商品房社區的角色漸為尷尬，業委會的居民自治特色與業主本位立場，對於國家基層政權的能力貫徹，更形同威脅。與之相較，對於舊式的老公房「單位社區」，雖然由於舊有住戶隨著房屋產權的獲得，有權力成立業主委員會，並僱傭物業管理機構，但在實際上往往透過傳統的居委會負責社區物業管理事務，形同國家越俎代庖，此時居民反倒傾向由居委會負責，做好物業管理的責任，居委會卻又受限先天資源稀少，而力有未逮。<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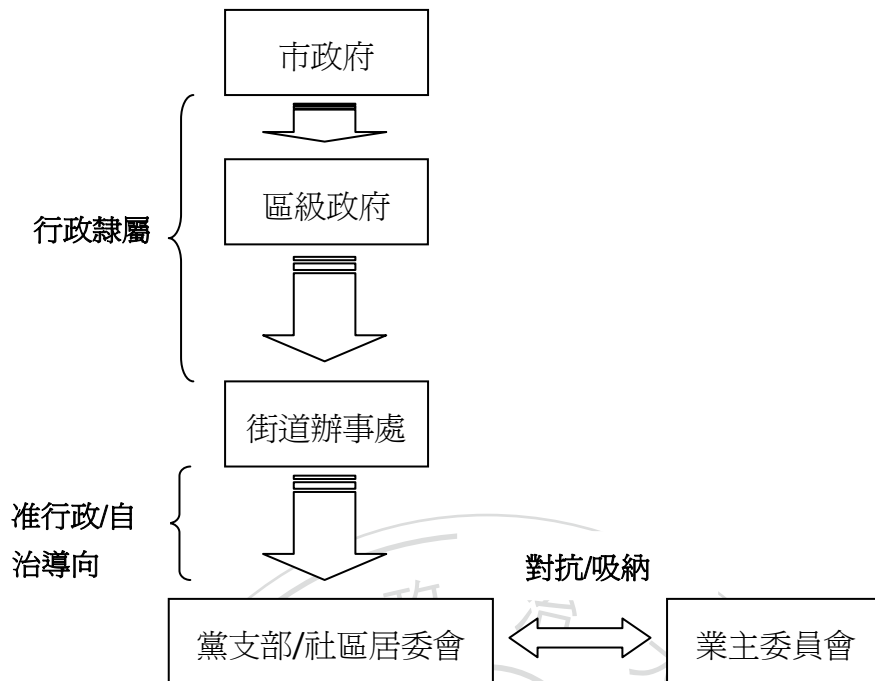
就此，經過歷屆換屆居委會直選，城市管理機構日漸摸索出因應之道。以大上海地區的情形，居委會的「行政化」體現落實到居委會透過各種非正式網絡深入「業委會」的情況，居委會甚至反過來透過吸納業委會代表的社會資源，解決基層資源的稀缺困境（邱崇原，2006）。對於單位社區，則透過傳統黨國動員網絡的找回，改善先天因素不良的情況。就此角度，居委會換屆直選過程，則不啻為黨國強化基層網絡的動員操演，極具特殊意義。上海歷經 2003 年、2006 年及 2009 年三年一次的換屆選舉，至 2006 年擴大居委會選舉直選範圍達到約 55% 的覆蓋面，是中共建政後基層直選的最大規模（左志堅，2006；敬義嘉、劉春榮，2007: 135-136），事實上我們可說是透過選舉，反過來強化基層組織的管控能力。

---

<sup>19</sup> 另一情形是，這類單位型社區的物業管理機構多數是由計畫經濟時期的城市「房管機構」轉化，具有公營色彩，居委會自身根本無法控制這些組織規模、官商網絡極強的物業公司。

總結上述，本研究將城市基層治理圖像做成圖 3-1，並大致說明，中國城市的城市管理體制依循著「兩級政府」(市、區)的行政層級，從市政府—區政府—街道辦事處三者構成了整個從上到下的行政層級，區級政府則直接負責了基層建設工作的成敗，進一步而言，區政府的職能承擔了整體基層資源與組織分配，街道辦事處則對居委會有行政管控的關係，居委會雖在法規基礎具有「自治權利」，日常行政事務卻仍必須受到街道辦事處的指導。而居委會內部的黨支部則扮演了橫向聯繫的角色，將社區內部居委會的各項工作，透過黨支力量結合起來，而黨組織的向下延伸，對於社區黨員的動員，更強化了居委會對外的聯繫功能。另一方面，居委會與業委會雙方則呈現緊張的關係，但做為正式的基層行政組織，在名義上，業委會無法凌駕居委會成為政治力量，居委會則透過非正式網絡的吸納手段，試圖掌握業委會的運作。

因此，大上海地區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可謂有其意義。上海市的行政高度導向特質，及社區組成性質的多元面，甚至由於各區政府稅收差距導致的行政管控程度與資源投入的差異，使得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社區個案比較，排除本研究對立假設。且若在不同的社區性質，及選舉過程特徵的差距，仍然可使本研究假設得到印證，則吾人至少可得出，選舉對於個體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確實有所轉變的推斷。我們將在本章第二節，透過個案比較的研究設計，進一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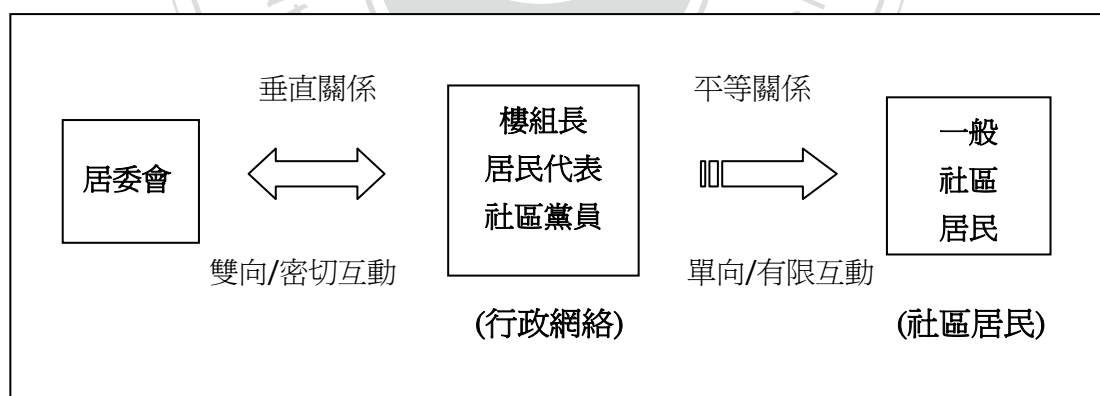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圖 3-1 城市基層治理的圖像

## 二、居委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過程

簡單的說，對於威權政權，進行一場選舉，沒有「投票」(voting)決定誰當家的意義。除了「合法性」的疑問，選舉之於非民主國家，做讓人困惑在於：多數時間，選舉並不涉及政治權力的「重分配」、更不是社會資源的重整，而是一場政治表演的大規模校閱儀式。政權必須消耗成本、必須投入資源，因為選民欠缺主觀意願，必須「動員」它。中國城市基層選舉過程同樣面對前述困擾，正如我們在前段所觀察的，我們無法推論居委會的轉型過程是場從下到上掀起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更多時候他像是基層行政組織「甄補模式」的「調適」，居委會換屆選舉的過程正顯示了這種情況，選舉究竟是「有限競爭」(競爭式選舉)還是「菁英吸納」(組織幹部篩選)有很大的疑問。但這種基層治理機制轉型造就的「縫隙」，確實也創造了更多參與契機。

按作者個人田野的觀察，發現換屆直選以來，基層黨國體制確實將選舉視做「政治任務」，且若能組織屬意的人選「走過場」選出來，可說是再安全不過。<sup>20</sup> 整個選舉過程如同要社區居民投入選舉工作卻很少給予回饋，既是黨政幹部的篩選過程，也是透過選舉動員將更多的社區居民「拉攏」至黨國網絡。就此，根據上海民政局發出的居委會換屆工作手冊（2006），整個選舉過程中，黨國網絡至少需要上門接觸居民四次，分別為：1.初步宣傳與選民登記、2.候選人提名、3.發選舉證，4.投票動員（邱崇原，2006）。而按照目前選舉法規，居委會候選人達到當選資格必須滿足社區合格選民投票率過半、候選人得票率過半的「雙過半」條件。在此項條件的基礎上，黨國網絡必須盡最大的力量去動員社區居民，平時的拜訪與選舉接觸的摸底占了重要的角色。當然，若是「工作不到位」，則形同居委會組織工作能力的否定，選舉扮演的考核機制作用，等同反映政權在基層的國家能力，雖然事實上基層黨國網絡有時力有未逮。



資料來源：修改自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521）。

圖 3-2 社區選舉動員架構圖

圖 3-2 大致可以說明社區選舉動員的情況，正如本文第二章討論，城市基層的選舉動員，主要透過「兩級傳播」(two-step flow communication)的模式，中間

<sup>20</sup> 訪談案例 3、11、27。

扮演關鍵進行傳遞訊息的核心角色，乃是由「樓組長」、「居民代表」、「社區黨員」等組成的「行政網絡」，樓組長是社區各樓各棟的義務人員，名義上是由居民選出，但通常經過社區行政組織事先的摸底，再由居民合意。居民代表則也是由居民選舉產生，按《居委會》組織法規，代表居民召開「居民大會」，但正如中國「全國人大」，徒具橡皮圖章意涵，名義上監督居委會施政，結果卻是一樣做為居委會與基層黨部的「兩條腿」，扮演動員角色。社區黨員則由居委會內部的黨支部發動，社區的黨支部亦會按社區的黨員比例再往下延伸幾個黨分支，便於動員。但正如圖 3-2 顯示，居委會與行政網絡呈現了雙向且密切的互動的情形，與一般社區居民，雖然在社會身分上同處平等，社區居民處於被動員的狀況，反而可能強化了兩者之間的疏離感。按作者個人田野觀察，處於高參與群體的行政網絡參與者，最終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要不持續對黨國輸誠，要不與黨國發生爭執，走向反動，重新構築自己的網絡。而對於一般社區居民而言，這種選舉帶動的參與情況分殊不同，對於先天存在反抗意願的參與者，最終會強化反抗群體的出現，且更有意願與黨國抗衡。我們會在接續的章節深入探討這些情況。

## 第二節 社區選舉過程的個案比較

在本節，我們將觀察在不同社區中，選舉過程中「選舉動員」(有/無)與「人情網絡」(有/無)，是否導致不同的政治效應，進行歸納。本研究認為，社區性質的差異，不會影響到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因果關係。在具體研究設計上，我們按照「米爾比較法」(Mill's Comparative Method)的「最大相異個案比較」(Most Different Case Comparison, Gerring, 2001: 212-215;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31-46)對異質性社區進行挑選。本研受限於非隨機抽樣的「少樣本」(small-N)情形，惟在研究策略上透過有意識地選擇社區個案(intentional selection)並建立「對照群體」(contrast space)，方能降低選樣誤差(selection bias, Collier and Mahoney,

1996; King, Keohane and Verba, 2001: 129-137)。就此，本研究嘗試挑選上海市閔行區 GR 社區及上海市靜安區 HQ 社區，兩個社區異質性極高的社區個案，透過田野實證資料，進行比較。

### 一、對照群體：HQ 社區居委會

HQ 社區居委會位於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一帶，社區附近即地鐵二號線靜安寺站，離上海著名景點靜安寺約有八百公尺，有良好的住房品質。在中共建政前，愚園路屬上海中高白領居住地帶，關鄰租界區，充斥西式花園洋房。在共產黨接管上海市後，這類西式洋房社區，逐漸轉為單位型社區，HQ 社區共有三塊西式洋房式公寓建築，前幾年才經過維修改建。按作者觀察，HQ 社區至今仍保持單位社區模式，社區居民組成主要由國有企業員工構成。<sup>21</sup> 在 90 年代後上海市都更的老公房改建政策下，多數居民仍透過購買住房產權的方式，並未出現搬遷的狀況。受過去國企單位體制影響，社區居委會沒有「老黨員」、「老革命」的操持，很難成功。<sup>22</sup> 事實上，在靜安區的街道辦眼裡，HQ 社區可謂十足的「模範社區」，小區問題甚少，且居委會職能高度行政化。按作者個人調查，2009 年換屆選舉 HQ 社區選民登記共 3064 人，合 1600 戶，具有國有企業工作經驗的群體占了約七成以上，黨員、舊公會人口有一定比例，歷次換屆直選也都能達到「高投票、高得票」的「雙過半」保證。

但經過田野觀察選舉過程後發現，即便是 HQ 這類典型「樣板社區」私底下仍是暗潮洶湧，HQ 居委會選舉雖仍維持著極強的動員能力，但卻與人為因素有很大的關係。作者訪問的社區積極分子王先生即表示，過去社區工作的進行，很

---

<sup>21</sup> 資料來源：訪談案例 6、8。

<sup>22</sup> 陪同作者參訪的復旦大學熊易寒老師即表示，這類社區黨委書記有些都是國有企業公會主席出任，退休的工人再從單位流入社區，居委會「領導班子」的意志從上到下貫徹，黨建工作事實上非常強。訪談案例 1、6。

大一部分與前任社區黨委書記的個人特質有關。<sup>23</sup> 若是沒有支部書記的帶動，單單黨務機器投入顯然無法激起參與意願，一個現象是樓組長<sup>24</sup>、積極分子及黨員雖然會在選舉中被動接受選務動員，但若沒有主觀參與意願，則投入情況便會降低。<sup>25</sup> 換言之，單是動員帶動並無法使個體參與，若是個人主觀的能效意識並無提昇，也沒有動機促使投票。進一步而言，我們大致可從 HQ 社區透過「選舉動員」出現高參與情形的選民，區分兩種群體，有人樂在其中，深感榮耀；有人卻只是當成「形式任務」，虛應故事。如作者觀察 2009 年 HQ 社區居委會選舉投票過程發現，雖然當天一早，社區可謂沸沸揚揚，街道辦幹部蒞臨視訪，社區居民投票可謂意願踴躍，但到當天下午計票結束，主要擔任選務工作的居民卻是「一哄而散」，與其他社區居委會選舉過程結束高參與踴躍群體開心慶祝的情況大異其趣（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 536）。<sup>26</sup> HQ 社區居委會的情況似乎說明了，當選舉動員的過度行政化特質，反而會使個體投入意願降低。

作者對於投票過程當天另一觀察是「人情網絡」並未產生關鍵性作用，結果發現，雖然老式社區的「強鄰里」關係，使得 HQ 社區積極分子與多數社區居民極為熟稔，在選舉游說過程仍是採取間接軟性的「人情說服」（劉春榮，2006），且對於政治冷漠、心無定見的社區半數居民有所影響。但對於主觀意願能效意識極強的參與個體，卻是毫無作用。顯而易見的是，當選民呈現「低認同性，低防禦性」能效意識時，這類「人情說服」才能產生作用。如作者當天訪談退休高校

---

<sup>23</sup> 訪談案例 9。

<sup>24</sup> 城市社區基層的「樓組長」（或稱「樓棟長」）類似台灣的鄰長，乃社區各樓棟/門棟的義務服務人員，經常構成居委會工作網絡的一環與選舉動員時的「動員機器」，而為社區居委會所「行政吸納」。他的日常行政功能是作為居委會與社區居民的仲介者，負責蒐集所屬樓道居民的意見與狀況，報請居委會協助解決，另一方面，「樓組長」也負責傳遞居委會訊息給社區居民，成為居民和居委會之間的溝通橋樑(Read, 2003: 57)。

<sup>25</sup> 這種情況似乎顯示，若是不存在群體認同且有參與意願，單單是黨國力量的動員並不足夠，王先生便跟作者表示，前任黨支部書記在帶動工作、激起大家參與熱情極為認真，而使他人願意與他配合共事。

<sup>26</sup> 根據過往田野觀察，選舉過程高參與群體在選後往往凝聚極強的網絡與群體認同，我們可將其視為由於選舉動員最後導致群體自主力量的結果，這種情況使得部分研究將選舉動員的結果傾向樂觀的觀點（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



老師陳教授，對於執政當局充滿懷疑心態，但仍認為透過選舉或許能產生一定作用，而出現高防禦性功效意識，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的情況，他表示：

居委會選舉平常根本都是搞形式主義，我只是來完成任務而已，主任副主任候選人我也都不認識，居委會平時跟街坊互動也沒很頻繁，也不好好做基層工作，愚園路路口的道路問題積年累月了，也不好好解決，下面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訪談案例 5】

事實上對於陳教授來說，他人的人情勸說並無法改變他的投票意願，他傾向自主性投票，即便這張選票最終可能會「打水漂」。而這類由防禦性功效意識衍生的「選票制裁」心態並非單一情形。另外，當認同性功效意識高、防禦性功效意識低，即便他原本有較高的黨國認同意識，若是對政治失望，仍會不再「忠誠」，HQ 居委會選舉結果顯示有 1 位規劃人選並未當選。<sup>27</sup> 對於居委會選舉會出現意外只有一種情況，當街道辦規劃年輕、大學畢業且原具有社區社工身分的人士進行參選時，若前屆社區幹部對於現狀「失望」出現「造反心態」，便會採取「退出」的政治行動，透過社區議題凝聚群體共識，凝聚傳統網絡。換言之，並非「人情網絡」並未無法產生作用，而是當選民存在自我認知的功效意識、決定其選票、與政治行動時，「人情網絡」不再是關鍵。

居委會選舉過程的另一情況是造反踴躍，當天投票過程即有人糾眾鬧場，而且訴求仍是道路問題，一位社區維權居民當場跟街道辦官員抗議：

<sup>27</sup> 按作者觀察，HQ 居委會選舉結果意外當選人身分是上屆居委會委員之一，這類在換屆選舉的情況，通常都是上層機構規劃中的「陪榜」人選，避免出現社區反抗者當選的意外。這主要是受制於 2009 年換屆居委會選舉「年輕化」的訴求，使得很多社區居委會委員形同「強迫退休」，充滿政治不滿。很多選舉結果卻顯示了區級政府這項政策並不太成功，有很大部分這類「陪榜」人選最後卻仍當選。訪談案例 2、6、15。

我投訴，跟居委會幹部反映，只給我上面電話。(居委會)只會搪塞，不會解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手拿法律章本)，人民有申訴的權利、有投票的權利，居委會我們都不認識！要居委會做甚麼？【訪談案例 6】

對於抗議群體而言，這類政治表演場面顯然極為嫻熟。重點是，他們不單會使用抗議行爲，且善於利用手中的選票。他們不單熟知選舉既有規範，且知曉選舉種種缺失。當他們在行使「呼籲」的政治行動時，則不啻爲政治功效意識的悄然變化，即便是存在政治不滿，但仍身體力行，力行選舉的規範意義。則隨之而來的消極抗議，仍充分展現其所具備的防禦性功效意識。此外，不僅是消極抗議，事事上這群抗議群體在整個選舉過程中積極對抗了選務人員，表達了選務不公，最後仍利用手中的選票，透過選票所賦予的「自我推薦」<sup>28</sup>機制，聚集了部分票數。

事實上，觀察整個 HQ 社區居委會的選舉過程，可以發現國家介入的情形極爲明顯，從選舉初期黨支部的操持佈建，各個樓組長、積極分子的投入可以說明選舉動員的強力執行。居委會的社工范老師即表示，居委會的社工有責任要自動串連網絡。對於日常工作，社工都必須要透過樓組長對社區居民記錄情況，甚至也要掌握租戶人口(約占 30%)，在選舉時也要詢問其是否參與，進行選民登記，並由樓組長、居民代表每人負責 10 戶人家串連。<sup>29</sup> 再來，對於整個候選人的安排，可說是煞費苦心，居委會選舉的居民大會、見面會能免則免，陪同參訪的復旦大學劉同學跟作者表示：

---

<sup>28</sup> 未得到正式提名候選人，在投票當天可於選票上預留的空白欄位填上姓名參加競選。在中國基層選舉，由於一般選民多會直接圈選正式名單候選人，極少另外推選。故自行推薦的候選人，往往因得票不足，難以當選。前基層人大代表，著名獨立參選人士姚立法即是一例。

<sup>29</sup> 訪談案例 8。

本區實際上根本沒有候選人見面會，所謂的「預選」只是對外宣稱，實際上都是透過協商產生，前屆居委會委員有一位就於協商過程被「搓掉」。**【訪談案例 8】**

但很顯然地，這些事前準備工作到了選舉當天仍是無法避免這些突發場面，即便選舉動員、人情網絡可謂綿密遍佈，仍改變不了當個人主觀投票意願上升時的政治行動抉擇，HQ 社區的選舉過程有人最終走向了不同的結果。陪榜者由於「失望」走向「退出」的政治行動，反抗者採取了「呼籲」，我們將在第四章進一步說明這種「心態意願-政治行動」的銜接機制。

## 二、GR 社區居委會

與前述 HQ 社區性質大異其趣，GR 社區可以算是 90 年代後大上海地區都市劇變後，典型新建的新興商品房大廈社區。而政治大學基層選舉與治理研究團隊，曾於 2006 年換屆、2007 年進行田野調查，作者並於 2010 年隨同團隊進行調查，故累積「貫時性」研究資料，方便吾人便於進行時序比較，並強化個案信度。就此，GR 社區可說是觀察大上海地區政治集體性事件及組織化社會力量浮現的極佳場域。<sup>30</sup> 另一方面，GR 社區的基層選舉經驗，社區居委會藉由 2009 年換屆選舉的治理機制重塑，卻又可視作黨國收攏、個別擊破，找回基層網絡的典型個案（邱崇原，2006）。但據作者個人 2010 年的田野觀察，卻一定程度推翻上述見解。

---

<sup>30</sup> 訪談案例 19。部分觀察參照政大基層治理團隊於 2006、2007 年的田野觀察。

GR 社區位於蓮花南路滬閔路口，緊鄰地鐵一號線蓮花路站，由 27 幢多層、小高層組成的商品大廈。就位置上而言屬於閔行區，距離南上海最繁華的徐家匯也只有五站地鐵。閔行區屬於上海新興的開發區域，隨著科技產業與高校的進駐，吸收了高白領、高經濟水準的新興都市人口，成為南上海人口密集的都市聚落。一般而言，這類社區通常存在著普遍的政治冷漠與人際疏離，但田野資料卻顯示，GR 社區 2006 年換屆選舉的投票率即達到了 65%。<sup>31</sup> 在社區「委託投票」<sup>32</sup>並未濫用的情況下，這是極不尋常的數字。而按作者個人觀察，GR 社區雖然有一定比例的黨員人口，雖然設了一黨總支，下轄三個黨支部，但平常黨員間連絡極為稀少，多數黨員也並未參與社區事務。<sup>33</sup> 真正能夠提高居民參與動機的，主要是小區的「物業糾紛」<sup>34</sup>與「政治性事件」。

回顧 GR 社區 2006 年居委會第一次換屆選舉的過程，也面臨上層機構對於基層選舉「雙過半」要求，造成選舉過程的龐雜以及達標壓力，使得居委會選舉必須要在有限的力量下，運用最小成本去達成黨國意志。但社區黨政系統最後仍成功了重塑權力，找回網絡系統，瓦解了反對勢力。<sup>35</sup> 然而，作者訪談後發現，這群少部分的骨幹分子之所願意配合，來自於對於社區事務現狀不滿激起參與意願。此外，由於選舉過程中激發的抗議群體，在選舉過程衍生不滿後，走向了體制外的政治行動，使得黨國最終在付出極小的成本控制下，彌平各自盤算、未能

---

<sup>31</sup> 訪談案例 24，參照 2007 年政大基層選舉團隊田野資料。

<sup>32</sup> 委託投票在正式的選舉法規稱做「複票權」，一般而言這種制度慣例可說是提供基層黨國組織大規模作票的溫床，社區積極分子通常會對低度參與或不願投票的選民游說「轉讓投票權」，最常利用的就是人情壓力(劉嘉薇，2006)。但由於 GR 社區完全按照選舉法規，一人容許至多委託投票三票，若是以同戶人口一家三口計算，尚稱得上合理範圍。

<sup>33</sup> 訪談案例 20。

<sup>34</sup> 城市基層「物業糾紛」的出現，主要是隨著新式商品房社區逐漸的普及，社區公共設施的維護由市場化的物業公司接手，而居民透過住房產權轉換成為業主身分，依照法規組成另一個組織——業委會，加以監督，並有權更換物業公司。這類似於台灣社區的「社區管理委員會」。「物業糾紛」主要圍繞著居民與物業公司由於社區事務公共維護的糾紛，與和傳統社區權力結構迥異，城市居民要求對社區事務主要負責的對象不再是「國家」，而是市場社會象徵的「物業公司」，業委會因此轉為另一個社區權力競逐場域。

<sup>35</sup> 訪談案例 23、24，參照 2006、2007 年政大基層選舉團隊田野資料

成功整合的反對陣營，最終取得獲勝結果。<sup>36</sup>

因此，真正整個居委會選舉參與效果的根源，事實上主要是由於業委會衍生糾紛蔓延到居委會選舉。<sup>37</sup> 歸根究柢，仍是由於社區特定議題造成的參與後果，而「通過參與認識社區」，將原本屬於「福利需求」（分潤權益）轉向「參與需求」（決策參與）的具體展現（楊敏，2005: 86-87）。由於特定議題發酵促成的參與意願，則不啻為政治功效意識的提昇。此外，GR 社區 2007 年由於磁浮列車興建掀起的「維權事件」，也是各地串連業委會之一。<sup>38</sup> 這些業主事件衍生的特定議題，促成社區居民主動的參與動機，並強化了內部的倡議網絡。就此，居委會選舉表面上成功的選舉動員，可能是社區內部小部分群體網絡發揮的效果。

且事實上，即便是原本同樣心態的參與網絡，卻在選後也出現鬆動的情形。按照研究者個人觀察，「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參與個體心態，卻因為對選舉結果的預期不同，出現了後續不同的參與行動。研究者訪談的高老師，在參與行動上仍保持政治「忠誠」，對於選舉後續帶來的政治效應，並沒有太大的不滿。<sup>39</sup> 相反的，與高老師極為熟捻的江媽媽，曾是現任居委會主任當選的重要推手，卻在選後由於政治事務上的落差，而「退出」了政治行動。在訪談過程中，江媽媽曾表示：

小區存在很多事務必須解決，但業委會並沒有解決的方法，物業公司<sup>40</sup>的問

---

<sup>36</sup> 研究者在訪談及收集田野資訊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說法是，GR 社區的居委會選舉，是由「六戶」為單位的鄰里核心網絡，發揮了廣泛的社區影響力，最終將現任居委會主任拱上。

<sup>37</sup> 訪談案例 21、22。

<sup>38</sup> 2007 年上海磁浮列車問題掀起的維權事件，主要是沿線居民擔心磁懸浮鐵路會帶來輻射和巨大噪音，結果超過上萬名社區居民「漫步南京路」，事實上這是背後有各地業委會串連的結果。此事件在媒體炒作，相關的社區居民在事件過後，往往都避而不談。訪談案例 18。

<sup>39</sup> 訪談案例 22。

<sup>40</sup> 物業公司是負責社區公共設施維護的產權公司，諸如美化、整潔、社區停車位、公共用地維

題很大，社區停車位問題、大廈門面維護粉刷，卻沒有任何幹部願意好好處理。……對嘛，如果物業問題沒辦法解決，最終仍是要「上法院」。【訪談案例 25】

諷刺的是，高老師正是 GR 社區業委會的委員，就研究者的觀察，江媽媽不會在高老師面前表達。這驗證了本研究假說 2 及假說 3，「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參與行為者，會因為對選舉過程的「失落」與「達標」，有不同的政治行動。另一方面，研究者透過了江媽媽的介紹，認識了社區的政治異議者馬先生，馬先生的白領身分，與黨國並無太大的瓜葛，對於各種選舉規則、及上訪機制甚至是法規運作，極為熟悉，也非常熱心參與社區事務，時常在社區的物業論壇發表意見，我們可將其視為「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的參與心態。但他在黨國支持者的眼裡，是屬於「被拉攏」的對象，卻不是共同的夥伴。<sup>41</sup>

值得關注的是，馬先生跟研究者談到 2006 年居委會換屆選舉時，曾經有極為激進的反對力量，馬先生曾表示與他們有所往來，雖然認同其立場，卻不贊成其激進手段，馬先生自認為是不屬於任何一方的中立人士。但在高老師的見解下，認為這群反對力量是「手段骯髒」、「非理性」，甚至會在社區「抹黑謾罵」業委會都是居委會、黨機構的「走狗」。<sup>42</sup> 高老師並認為，居委會換屆選舉很多

---

護等。這是中國城市居住環境市場化與新式商品房普及的結果，社區居民則作為業主代表，組成業委會加以監督，並有權更換物業公司。

<sup>41</sup> 高老師曾跟研究者表達，馬先生是社區的異議族群。雖然在日常社區活動中，高老師與馬先生雙方仍維持良好的互動，但並未徹底交心。高老師將馬先生稱之為跟社區的「壞人」較為親近的人士。事實上，所謂「壞人」指的是在居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採取激烈對抗手段的社區反對人士，高老師與該方極度交惡。

<sup>42</sup> 據作者觀察，這群所謂的「壞人」多數與馬先生背景類似，如抗議群體的首要核心人士是上海高校鄭老師，裡面同樣有很多大學教師，及樓組長，他們出於整個社區的物業資源分配有更強烈的企圖心而行動。事實上這群抗議群體上訪與上法院的頻繁程度，甚至讓居委會最初都以為「背後有靠山」。換言之，他們對於抗議手段的掌握與政治行動的操作嫻熟，反而很難說是「非理性」。

人是「賭爛票」，爲了遏止這群反對力量進入居委會。事實上觀察，整個選舉過程，主要由於認同黨國的少數群體，與阻擋這群反對勢力的進入，最終合縱連橫下的競逐。<sup>43</sup> 這種情況，我們很難說是「選舉動員」、「人情網絡」的力量展現。

此外，微妙的是，江媽媽對於社區的反對意見正是研究者在馬先生訪談過程中所表達的，他甚至贊成馬先生解決物業問題應採取法律途徑的看法，雖然他在一般日常的社區參與始終表達緘默，不再表達政治意見。這衍生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選舉過程失望浮現時，認同性功效意識高的參與者，爲何寧願選擇「退出」的政治行動，而沒有表達出「呼籲」的發聲。

### 三、小結：比較發現

根據前述發現，吾人可以觀察到「選舉動員」、「人情網絡」的有無，並不影響「參與意願」-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因果關係。本節研究設計主要將 HQ 社區做爲對照群體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強-選舉動員」、「強-人情網絡」並非促成選民持續參與的主因，透過選舉過程浮現的自主意願似乎更能解釋政治行爲。HQ 社區的情況更顯示，當選民參與意願皆低的情況，人情網絡的面子作用方能產生效果。而在面臨社區特定議題情況時，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將會顯著提升。此外，社區業委會對於社區居民政治行動究竟會產生多少影響，仍尙待觀察，但我們仍可將業委會出現的糾紛情形，視爲社區特定議題導致的結果。根據上述，我們將研究發現整理爲（表 3-1）。

---

<sup>43</sup> 在這個過程中，馬先生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居委會「執政當局」的居民核心網絡，主要透過各種日常社區活動，如邀請馬先生參加「橋牌社」把他拉攏的較爲親近，落實「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將反抗群體的力量削弱。訪談案例 20、22。

表 3-1 社區特徵與選舉過程比較

居委會	社區性質	選舉動員	人情網絡	政治功效意識	抗爭行動
HQ	公房改建	強 (黨國動員)	強 (鄰里關係)	部分選民 顯著改變	強
GR	白領社區	弱 (自主連綴)	弱 (生疏冷漠)	部分選民 顯著改變	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第三節 選舉過程觀察：政治功效意識與參與行動的抉擇

在本節，我們主要說明在選舉過程，由於政治功效意識所導致的參與行動抉擇，個別功效意識提昇的選民(防禦性功效意識高或者認同性功效意識高)，會如何採取他的政治行動。研究者試圖指出，當不同參與心態根源誘發的參與意願時，會在具體參與行動導致不同的選擇，這也將會進一步影響選民在後續政治效應上，有不同的結果。進一步而言，選民的心態轉變可能是由於特定因素的觸發，使得其將參與意願真正轉化為實際的落實行動，而選舉過程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下，茲採取「影響能力」、「投票偏好」、及以意願走向行動的「轉化途徑」三個面向對行動特徵進行具體分析。我同樣使用田野資料進行驗證。

#### 一、防禦性功效意識-「高」

##### (一) 影響能力：政治議價

正如楊敏(2006)指出的社區選舉普遍存在「權益性參與」的情形，這種參與根源在於能對於社區權力結構現狀做出改變。我們觀察具有「高」防禦性功效意識心態選民對於整個選舉過程的主要影響能力是「政治議價」。具有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參與者傾向改變現狀的政治資源分配，並相信選票是他們爭取權益的工具，因為當手中有票，執政當局也有獲得選票的需求，只要反抗就能討價還價，



即便最後競選結果可能並不符合自己的「最佳選項」(選舉翻盤),但卻也能有些許獲益(當局攏絡資源)。觀察 GR 社區的可以發覺這種情形,社區的反抗群體在與執政當局的居委會選舉中,試圖改變權力結構,「推自己人上馬」。<sup>44</sup> 即便最後功敗垂成,但透過這種選務工作操持的參與浸潤,使得反抗人士的防禦性功效意識提昇,為選後後續的政治行動累積了動能。

具有防禦性功效意識心態的選民另一影響能力是對於整個選舉程序的熟悉程度,事實上,若反對者對於選舉程序及選務法規的理解越為熟稔,該社區的選務弊端可能就越少。按作者個人田野觀察,若選區的反對者越能理解選舉法規,則諸如「流動票箱」、「委託投票」這種選務違規亂象就能減少,就如 HQ 社區選舉的即為一例, HQ 社區選務委員會設立的兩個投票處,秘密投票區形同虛設,多數選民當街圈選選票,更有在選舉結束樓組長才將「委託投票」投入票箱的情形。反之,作者觀察的另一觀察選舉過程的 CL 社區,由於社區反抗群體出面競選的情形,反而選務過程較為公開化,委託投票的情形也較為減少。<sup>45</sup>

## (二) 投票偏好：擴大競爭/拒絕合意

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在投票偏好上,由於反抗/不滿執政當局的心態,在整個選舉過程,不單要求程序上的公平,而是參選資格與候選人能時職參選的「實質公平」。對於中共的上層執政者而言,整個居委會換屆直選過程最懼怕的情況是最後有人「意外當選」。意外當選並不意味選舉翻盤,但對之後居委會日常事務造成極大影響,造成區政府與街道辦極大的困擾。一個比較誇張的說法是,居委會的上層機關與黨支系統都有一分「幹部名冊」(Nomenklatura),對於整個居

---

<sup>44</sup> 事實上這種心態也確實威嚇到居委會組織,因為確實有反對人士透過選舉抗爭進入業委會,出於這種恐懼心態,使得居委會必須不斷與社區較親近的群體維持關係,避免淪為相對少數。訪談案例 19、21。

<sup>45</sup> 訪談案例 13。

委會選舉規劃當選名單早以事前安排且經過嚴密考核。<sup>46</sup>

面對此種困境，具有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一個最常見情況是選務會議上進行杯葛，並要求更多人具有競選資格。由於候選人資格依照選舉法規必須經過社區選務會議篩選，上層機關往往會透過這些磋商過程，試圖安排出上層與社區都能接受的規劃候選人，反抗者則會站在反對妥協的立場，讓社區反對領袖得以「扶上馬，送一程」，能合法進行參選。若是失敗，另一個常見的手段則在最後的選票單使用「自我推薦」，這在換屆直選的是常見現象，即便無法撼動選舉結果，若造成票源分散，至少能將部分黨國規劃名單「拉下馬」。

追究這些上述投票偏好的動機根源主因，主要是當選民具備改變現狀的意願的自信心時，便會促成實質的政治行動。當選民具有反抗心態，且認知到可透過選務的公平性達到實質的政治公平，便會轉而行動。正如一位訪談對象跟作者表示：

（我們）不是沒選過舉，國家需要依靠法治、制度，（居委會）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議事規則。居委會不能利用對他們有利的規則、與人馬，這要有一套完整的監督機制。【訪談案例 21】

### （三）轉化途徑：倡議集體

對於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願意將參與心態轉化成具體的政治行動的主要因素是「倡議集體」的形成。過往研究曾指出，社區黨國支持程度較高、且屬於

---

<sup>46</sup> 訪談案例 15

社區積極分子的選民在透過選舉參與及黨國動員後，形成了可觀而綿密的參與群體。<sup>47</sup> 但不單僅是黨國支持的參與群眾，作者發現在經過歷次的選舉操演及各式大小選舉抗議後，社區反抗參與者又更高的意願採取維權行動。正如 Tilly(1978) 將**集體行動(collative action)**定位於挑戰者與政府的持續互動，GR 社區的歷次選舉與社區事件培養更為熟練操作抗議行動的反對者。主要在於，通過選舉過程挑戰者發覺爭取社區資源是可行的，心態逐漸化被動為主動，而有意願進行更過激的行為。參與抗議群體另一特徵是「情緒的動員」(Aminzade and McAdam, 2001:33)，透過各種社區事件的激化，形塑出特定議題，既有網絡才足以成為「倡議群體」，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而選舉無形發揮了這種作用。這使得具有防禦性功效意識高的選民在選後將持續採取「呼籲」的政治行動。

## 一、認同性功效意識-「高」

### (一) 影響能力：表態黨國

「高」認同性功效意識心態選民對於整個選舉過程的主要影響能力是「表態黨國」，對於現存的政治體制採取了認同與維護立場。按作者觀察，主因在於這些選民對於居委會執政當局有較高的政治支持。<sup>48</sup> 與具備高防禦性功效意識心態的選民相較，高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並不具改變現狀強烈的意願。這使得他們在選舉過程中樂意積極支持黨國規劃人選、對於居委會的執政當局沒有太大的不滿。但必須注意的是，通過選舉過程，「高」認同性功效意識同樣認識到基層改選的重要性，研究者透過田野實證觀察發現，認同黨國不意味著單純配合，就算是傳統的黨國動員網絡仍會出現自主意見。作者訪談的 LS 社區積極分子李姓樓組長就跟作者表示：

<sup>47</sup> 雖然名稱各不相同，但不同學者皆觀察到基層選舉在選後培養出一批高黨國忠誠的參與群體，相關研究可見於桂勇(2003)等人，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劉春榮(2007)，劉嘉薇(2006)。

<sup>48</sup> 如 Chen(2004: 156-170)透過經驗數據觀察，對於城市居民對於執政當局與官員（尤其是基層政權）普遍有較低的「特定政治支持」(specific political support)，且並未與選民投票意願顯著相關，甚至對其有不佳看法（如：官員都在貪污）。但諸多田野觀察顯示，基層政權仍有為數許多的黨國支持群眾，對於基層政權如何「收攏」這些選民投入選舉，成了最有趣的問題。關於基層政權如何收攏、提高參與的過程探討可見邱崇原(2006)。

社區工作有社區仍要有自己的意見，街道辦說居委會：「居委會畢竟是民選的人民代表，做不好也不應是他們來負責。」這是什麼話？是不是因為民選不是官員也不必做事？【訪談案例 7】

事實上 LS 社區居委會正有一位委員，違背組織意願（自行參選）遭到權力架空的情況。<sup>49</sup> 具備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之所仍願表態支持黨國，最主要認同中共基層治理的改革訴求，且歡欣於社區自治/選舉的可能—居民得到「投票」權力、候選得到「參選」機會，並相信黨國主導下的民主改革方向（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這種心態通常最終會轉嫁到居委會主事者身上，若主事者有能力說服選民這類願景，則高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自然戮力支持，且有較高的參與投票意願，亦是浮現功效意識的展現。這似乎顯示了對於處於威權轉型政體而言，政治功效意識顯著提高與黨國支持上升彼此並未互斥。

## （二）投票偏好：國-社合意

「高」認同性功效意識心態的選民出現對於選舉過程的另一顯著改變是至少能達到「黨-社區」雙方都尚可接受的人選，即便這過程可能並非經由選舉合法程序產生，一定程度削弱選舉競爭性強度的作用。雖然，對於舊有黨國支持個體而言，我們極難在身上區分什麼是「社區認同」、什麼又是對於黨的忠誠與情感，這兩者時常極度混淆。一位居委會社工就曾跟作者表示：

---

<sup>49</sup> 這位居委會委員架空的主因是：黨組認為屆齡應退，卻仍參選連任，最後又當選。

在居委會，為社區工作，就是為黨工作。社區利益與黨一致，我們的工作就是展現對黨的忠誠。【訪談案例 11】

但正如林尚立（2006: 7）指出的：「基層社會組織的變化，使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發生轉移』」。事實上，社區黨支部組織的設立，反倒強化黨籍身分的「屬地化」，具備黨員身分的選民不再只有屬於組織的黨建工作，有時更需投入社區。而對於年輕、白領的青壯黨員這種情況更為明顯，事實上他們與社區黨支組織牽連甚少，反而更能達到更極端的「屬地化」，社區認同更為強烈。<sup>50</sup> 這使得整個選務工作在磋商候選人工作必須有一段徵詢過程，有時選人的決定過程就反映了社區力量的角力，若上層黨國要獲得基層支持，就必須採取類似「薦舉」的方式獲得同意，例如上層街道辦要將屬意的年輕社工轉為居委會委員，就必須仍保持在地者一定比例，若全數由黨上層安插，仍會激起基層支持者的反對聲浪。即便這最終使選舉形同「走過場」，但至少仍會達到實質參與行動。

### （三）轉化途徑：強化認同

選民將認同性功效意識走向實質參與行動的主因是，選舉過程中黨國支持群體的網絡力量，及內部強化認同過程。這肇因於透過選舉提供的民主認知、選舉互動，提供選民極強的公共參與學習。正如 Hirschman(1982)指出的：「公共參與的行動本身即是一種回報，而不必等到最終目標的落實」。透過互動過程，選舉提供實質的共享意義，並促成群體採取一致性的行動導向。而當選舉參與者認知到真正的「社區」樣貌，社區的疆界與認同才會存在。我們可以觀察到，選舉帶動不單是互動群體情感增加，同樣強化了參與者對於社區的認識。對於參與群體

---

<sup>50</sup> 事實上作者觀察青壯黨員不會將所謂的社區工作等同為黨奉獻，他們往往使用更為柔性的「社區活動」（如社區社團）取代真正的黨建工作。畢竟動輒對居民講「為黨奉獻」也會徒增厭惡，不如能免則免。訪談案例 13、20。

的認識此時創造個體對於社區整體的想像，交往互動此時也被具體的「社區活動」<sup>51</sup>取代，而產生了「我群意識」(we-group/we-hood)。但這種「我群意識」是否以激發後續更為自覺的政治行動？正如 2006 年政大基層選舉團隊觀察的田野資料<sup>52</sup>：

某某是 QL 社區居民，文革曾因發表大字報，遭發放北方勞改二十年，從此對政治失望，絕對不願捲入政治。因此，即便仍懷有社會的責任感，卻不願擔任何社區職務。但對居委會選舉，他則抱持「一定來幫忙」的態度，投票日清晨 6 點便出門，直到中午還未歇息。他表示之所以會願意協助選舉，主要因為認同居委選舉的民主號召，但對政治險惡卻依然心有餘悸。【訪談案例 26】

就算有極高的民主認知，只要對政治險惡心有餘悸，很難有意願回頭參與政治。

<sup>53</sup> 另一方面，GR 社區的情況顯示，具備認同性功效意識的參與者，多數都是出於社區利益的維護的行動，且有部分參與者最終選擇了「退出」(本研究假說 3)。這顯示了社區認同在選舉過後，最終必須回歸「物質性」認知。沒有直選的制度化作用，單是實質的民主號仍是空泛的詞彙，選舉不單提供參與心態的轉化提升，更是象徵資源分配的決定。當高認同政治功效意識的參與者，出現「政治失望」顯示了認同提升必須回歸實質的政治資源分配，有時也帶來了「麵包」。當麵包落空，退出的政治行動可能象徵了行使緘默(quiescence)的政治意涵。進一步而言，當我們在看待黨國認同者由於功效意識上升有更多的參與行為時，我們

<sup>51</sup> 一個極有趣的現象是，會參與社區活動的人，往往就是社區高黨國認同的主要群體。訪談案例 1、3、6、20。

<sup>52</sup> 同樣引述可見於耿曙、陳奕伶、陳陸輝 (2008: 527)。

<sup>53</sup> 事實上這位參與者背景極為複雜，文革時就讀清華政治系，在學時與朱鎔基同期，參與選舉與社區工作可能帶有贖罪心態，甚至是積極配合黨的工作求得自保。

不應將這樣的「社區認同」是由於黨國誘發，而有較為不樂觀的看法。即便是在黨國儀式性的集體操演後，選民仍是有具有走向自主參與的潛在可能性。

### 三、小結

在本節，我們觀察到，在浮現政治功效意識，並導致政治參與後。我們發現，選舉過程的帶動，無論是認同政治功效意識與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參與心態，選民最終仍須面對實質的物質需求，但這種心態到物質的轉換仍尚待處理。尤其是具備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如何浮現政治失望，物質性需求及認同心態對後續政治行動「退出」扮演何種作用，我們將在下一章探討。

總結本節上述，作者就居委會選舉過程選民功效意識與參與行動的關係，將田野觀察所得整理如下（表 3-2）。

表 3-2 治功效意識與參與行動的關係：研究發現整理

政治功效意識	參與行動		
	影響能力	投票偏好	轉化途徑
防禦性	政治議價/程序需求	擴大競爭/參選公平	倡議集體
認同性	表態黨國/鞏固領導	國-社合意/薦舉	強化認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歸納。

## 第四章 效能-行動「銜接機制」：選舉失望浮現的「退出-呼籲」

任何初入城市社區選舉的人可能都會困惑一個景象，那就是：到底是誰會出來投票？而這種高投票率又是如何維持？中國基層選舉一直維持著高投票率的現象，但與蘇東共產產權的「動員式」選舉經驗相較，這類選舉事實上不存在公民必須「強烈表達政治忠誠」的必要性，更談不上什麼「熱烈擁護黨的領導」。<sup>54</sup>而就中國基層民主改革的背景與方向，所謂的「城市社區民主政治建設」，強調的透過民主方式是吸納更多群眾參與社區建設（李帆，2006），很難說的上是維繫政權存亡的合法性訴求。<sup>55</sup>此外，社區選舉過程動員網絡的形塑，也談不上是「新傳統主義」的找回（Walder, 1988）。社區選舉普遍存在的動員的「資源困境」，此時執政當局維繫的方式只能跟參與者妥協，並且提供誘因讓參與者主動投入（資源）。對於此種社區資源稀缺、執政當局手上沒銀彈收買的窘境，我們似乎很難說這種社區選舉參與能最終會形成「資源性的爭奪」。<sup>56</sup>

針對此種黨國動員困境，Read(2000 ;2003b)給予了「地方自願主義」(local volunteerism)與「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兩個新假設解釋選舉高度參與的積極分子動機及人情說服產生的機制作用。<sup>57</sup>但正如作者上章的比較呈現，「選舉動

<sup>54</sup> Townsend(1967)與 Schurmann(1968)皆指出毛式選舉動員是過去傳統的選舉特徵，就蘇聯經驗觀察，則有體制懲罰與強化合法性意義(Furtak, 1990: 9-10)。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觀察到後共政權的政權合法性正處於意識形態讓位、經濟表現要求上升的轉化情況（吳玉山，2007）。事實上，社區選舉雖存在選舉動員，但與過去群眾運動方式有極大差異，不投票更不會遭到體制性懲罰。就作者個人訪談經驗，即便是再高度忠誠的黨員分子，也不會說出「把選舉搞好，才是擁護黨、擁護黨的領導」這種話。訪談案例 10、18。

<sup>55</sup> 一位街道辦官員即跟作者表示，選舉難做的是怕出現意外，因為「如果選出來的人跟我們『擺譜』，以後很難做事」。此處難做事指的就是「政令窒礙難行」，比較類似行政上的需求。訪談案例 27。

<sup>56</sup> 這種窘境最簡單直白的說法是「村委會主任能當土霸王，居委會啥都沒有」。訪談案例 8、14。

<sup>57</sup> 事實上，這種舊有制度性(及人際網絡)作用產生，甚至是制約個體心態，仍不脫是 Walder(1988)



員」激起參與或是「人情網絡」的「動之以情」並不一定必然導致選舉的自發性動機與政治行動。只要社區存在社區議題，或是透過選舉讓選民「發現議題」，則自主性參與的情況並非不可能。進一步而言，一個社區的**選舉制度效應**是否足以**塑造選民參與的「誘因結構」**，顯然才是問題所在。

再來，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個體的參與行動仍必須有所「回報」**。無論這個回報是「心理」或是「物質」的，否則難以形成一個持續的參與。測量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除了主觀的個人認知參與意願，仍涉及個人對於執政當局的「回應性」評估。換言之，無論是防禦性功效意識或認同性功效意識，只要高功效意識即意味著對於執政當局仍有所期待。我們可進一步推論，若是在經過選舉參與後得不到滿足，他勢必要「轉嫁」他的回報需求，去尋找除了執政當局以外其他的選項。我們接下來將說明選民參與意願的投入是否仍促成可持續的參與，而當這種「回報需求」出現「落差」時，他將會如何改變他的政治行動。

最後，回到最初提出的疑問，社區選舉誰來投票？又怎麼會這麼多人投票？誠然，城市基層選舉現有研究顯示，社區居民多數對於現行的選舉欠缺認知，而參與極大部分屬於退休群體、甚至是老年族群，使得一般選民與高參網絡呈現兩相不同的疏離現象（熊易寒，2008）。但作者必須指出，基層選舉的開放「不應馬上期待**最大多數選民**的投入而一步到位」<sup>58</sup>，少數的高參與群體若存在自主意願，且具備一定程度影響力，那就代表選舉確實帶動參與。其次，就作者個人田野觀察，這些高投票率的參與確實是有少部分群體帶動，由於社區往往存在著兩種群體，一派支持黨國、一派處於反對意見，各自的網絡同時發揮效能，則這些

---

以降「新傳統主義」典範思維。

<sup>58</sup> 現行居委會的相關研究時常出現一種背後預設：「若基層選舉開放，而投票率顯著提升，則對選民有民主教育意涵，就可為民主轉型奠基；若高投票率只是假象，則選舉就不可能基層民主轉變」。但這種「參與帶動民主」的線性發展邏輯不完全正確，多數民主轉型國家事實上在選舉開放初期也談不上投票率爆發，而是基層選舉開放帶動了資源分配的重塑及地方自治的政治投入。台灣的地方自治經驗即是顯著的例證。關於居委會高投票率意義探討見桂佳勇等（2003）、熊易寒（2008）。台灣轉型經驗見林佳龍（1998）。

少數關鍵者就發揮類似「意見領袖」的力量。<sup>59</sup>

總結上述，在本章我們試圖處理三個議題：首先，我們探討選民的**功效意識根源**，說明自主參與意願浮現的原因。再來，我們解釋**個體參與行動的「回報」需求**，及其「**落差效應**」造成的結果。最後，我們將處理「**效能（參與意願）-行動**」的**銜接機制**：選舉的「**制度效應**」，探討選舉過程是否有提供個體參與的「**誘因結構**」，並是否能為選民的「**可持續性參與**」奠基。

## 第一節 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根源

在本節，我們分別嘗試以「**社會基礎**」、「**政權支持**」程度，分別解釋居委會選舉選民政治功效意識浮現的根源。「**社會基礎**」說明兩種功效意識來源的社會結構環境，「**政權支持**」程度則是從選民的個人政治態度（支持政府於否）解釋不同政治功效意識的浮現原因。

### 一、社會基礎：

我們在本節主要處理一個問題：，「**防禦性**」與「**認同性**」兩種功效意識的浮現，是否有特殊的社會基礎造成？作者認為，「**防禦性**」與「**認同性**」功效意識浮現的社會結構面向很大原因是社會基層已形成支持黨國、反對黨國的兩種群體導致，而這有賴於前述國家資源投入與話語形塑導致的結果。以下，我們首先將回顧社區自治-與國家關係文獻的探討，次而分析兩個團體是否能為前述的政治-社會結構，找到自身的網絡與話語力量，而為自身的政治參與意願浮現奠基。

---

<sup>59</sup> 訪談案例 7、12、15。

關於基層治理領域，「國家如何找回社會」、拿回主控權相關探討，現行文獻大致仍不脫「國家-社會」關係的架構。<sup>60</sup> 第一個主要的解釋來自「國家中心論」，從國家機器的角度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大體循著「官僚資本主義」(bureaucratic/state capitalism)，其背後即是「食租國家」(rentier state)的邏輯，耿曙、陳奕伶(2007)更由此推論，由於基層選舉國家「社區建設」的訴求，基層政權將透過壟斷剩餘吸納社區菁英，達到「行政吸納政治」的結果。<sup>61</sup>

相對上述圍繞著資源分配的「需求控制層面」(control demand-making)，Davis(1976)從墨西哥的個案研究中探討威權政體的「動員支持層面」(mobilize regime support)則頗值借鏡。Davis指出，威權政體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提供給民眾的比較屬於心理層次的「象徵性保證」(symbolic reassurance)，來自政體對於特定目標的承諾，而非實質的物質供給。而之所以能夠成功動員群眾的支持，來自他寡占了「溝通網絡」(communications networks)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加上沒有反對黨提醒民眾執政者實際的表現，對於在政策過程中缺乏有效議價能力的群體(例如勞工階層)，就能夠透過象徵性的承諾而動員他們的支持。進一步而言，研究者認為，上述兩種分析層面實際上並不互斥，心理層面的承諾與溝通網絡間的嫁接仍有賴於政治資源的成本投入，而單是資源的給予若是不給予話語體系支持也很難維持政權合法性。

就中共選舉參與的現況，可以發現黨國投入社區資源普遍稀缺，卻需要參與者進行政治投入，降低治理成本。要用壟斷剩餘達到「行政吸納政治」的效果極為不易，必須先借用一套「話語體系」激發選民參與意願。這類治理方式確實使得基層成功找回「失聯黨員」，吸納在市場轉型過程中，黨國體制渙散流入社會的群體(Nee, 1989; 1992)。

<sup>60</sup> 相關探討可見 Read(2000)，孫立平(2001)，耿曙、陳奕伶(2007)，劉春榮(2007)。

<sup>61</sup> 類似的見解還有王信賢(2006)從社會團體個案觀察政權對社會中介組織的控制吸納。

進一步而言，這類選民，存在著「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選舉的政治儀式是黨國支持群體與基層政權重要的「情感依附」媒介，基層內部網絡有賴於成員的「情感性相互支持」，透過日常的社會組織活動與選舉的互動過程，喚回過去的政治信仰。黨國的「象徵性保證」透過儀式強化團結，使既有黨國支持者較高的意願投入政治參與。但結果可能是，社區自主意識尚待轉化，猶待突破，出現「**黨與社區認同重疊**」的情況。相反地，我們可以觀察到「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通常是市場轉型過程新興的社會階層，與黨國牽連較少。這種高所得、高知識分子的參與者，出於對自身權益、社區認同維護的迫切需求，必須尋找自身倡議群體的話語體系，而在反抗過程中強化了個體的功效意識，結果「自己找回社區」，學習了更多政治技能，為更多抗爭累積資本。<sup>62</sup>

## 二、「政權支持」程度：

上一段我們發現，就社會基礎的角度，「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雖存在自主意願，但卻囿於結構侷限，簡言之，即「話語權」及「參與網絡」與基層治理機制結合的情況，似乎難脫束縛。反之「防禦性」政治功效意識卻由於與黨國網絡牽連較少，須自己找回論述權，結果產生是較強的「社區認同」。在本段，我們則認為這主要是政權支持程度先天的差異導致的結果。而如同本研究在第二章所指出的，政權支持程度高，由於黨國支持根源，會衍生「高認同性」功效意識；若政權支持程度低，由於反抗立場，會衍生「高防禦性」功效意識。進一步而言，雙方在看待選舉帶動的參與效果有極大不同。

首先，在「高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情況。真正「**理應**」期待選舉可以帶動的資源分配的選民，是「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參與群體。但由於政權支持較「低」，

---

<sup>62</sup> 事實上這類具有「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反抗人士對於「抗議手段」極為擅長，在選舉過程更是宛如台灣早年抗爭行動「政治行動劇」，不啻為反抗者情感凝聚與儀式認同的大規模操演。

先天就存在較低的「政治信任」。進一步而言，若我們借用 Easton(1975)的「政治支持」概念，可以發現「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屬於反抗群體，對於政權整體具有較高的不信任，這種結果轉嫁到基層社區，即是對「特定執政當局」沒有過度的期待。<sup>63</sup>

但相反地，在「高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情況，我們可以說由於「高」政權支持，並透過黨國話語的操作及群體互動，減緩了「自身權益」與「社區自主意識」的發掘，卻有較高的政治期待。但另一方面，由於與執政當局的互動，政治涉入較深，卻會進一步浮現的較強烈的政治失落感。<sup>64</sup> 這符合研究者在田野觀察到的現狀，原本的高黨國群體，在累積政治自主意願後，脫離黨國，走向抗衡。或是採取退出，不再涉入政治，甚至與潛在反對者結盟的狀況。<sup>65</sup> 而這肇因於基層治理單位需要選舉參與投入，促成選民功效意識上升，最後結構侷限的情況。

「高認同性」功效意識群體的情況在現有「政權支持」的相關探討極有價值。過去研究如 Chen(2004)指出，城市居民對於現行政權支持程度沒有太大的差異，對於基層「特定執政當局」支持情形會受到執政者政治表現影響。「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選民的支持程度變化顯示了，對於特定執政當局的表現終將轉嫁對整體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情形，而走向退出黨國參與情況。這與「普遍性政治支持」與「特定政治支持」必須分類測量，兩者不存在交互影響的既有看法大異其趣，而具理論上意義。總結上述，我們可進一步推論，對於轉型中政權，若基層選舉效應帶來選民較高的政治失望，則最終可能危及整個政權的合法性。

<sup>63</sup> 我們大致可將對於政權的信任程度視為「普遍的政治支持」(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執政者短期表現是「特定的政治支持」(specific political support)。見 Easton(1975)。

<sup>64</sup> 這種情況符合後共政權的選舉後續效應的觀察(Bahry and Silver, 1990; Howard, 2003)。

<sup>65</sup> 關於黨國支持者走向抗衡主要來自於 HQ 社區、CS 二村的觀察，訪談案例 7、16、17。潛在政治結盟則見第三章 GR 社區案例。

## 第二節「失望」的浮現：選舉預期的「落差效應」

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情形，不僅反映個人主觀的參與意願，還有客觀對於執政當局的「回應性」期望。當執政當局對於選民的政治期望無法進行回應，選民浮現的「政治失望」將為後續的政治表達奠基。就此，Albert O. Hirschman(1982)指出，「失望」(disappointment)是造個體出現「私人-公眾」參與循環的主要因素，個人對於「私人參與」<sup>66</sup>及「公共參與」皆存在類似「消費產品」的需求，當產品「期望效用」與「實際效用」的落差，將會造成心理失落感，而這種心理失落會造成行為者有不同的參與偏好出現「轉換」。Hirschman 更指出，對於投票效應不符合理性選擇「成本效益」<sup>67</sup>的觀點，「普選權」的實施上是抑制了公民對於公共事務情感強度的表達，可以提供了公眾脫離激烈公共參與的機會，製造了強烈的「失望」，使群體生活走入個體，簡言之即預期效益極低的「消費產品」。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選舉效益的不滿足，使得其他政治行動，如：游行、示威、罷工等，會被重新發現成為新的參與管道。延伸上述觀點，我們可進一步觀察個體的政治功效意識在面對選舉過程的「失望」情形，而預測其後續的政治走向。以下我們茲對：1.「高認同性，低防禦性」。2.「高防禦性，低認同性」。3.「低認同性，低防禦性」三類群體分別分析。

### 一、「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期待過高，失望落差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參與過程，由於最初受到黨國力量帶動而投入，我們可觀察到這形同「群體性認同」塑造的過程。進一步而言，個體通過群體的「象徵性認同」(黨國群體)，感受到個人能影響群體事務。但由於對於政權整個有較高的政治期待，將會使他的政治行動從「忠誠」轉向「退出」。

---

<sup>66</sup> 私人參與在此處視為追求個人及家庭更好的「消費生活」及「生活福利」。

<sup>67</sup> Olsen(1968)指出，個體能夠在選票的「邊際效用」獲得的預期收益與成本差異極低，這構成個體不願投票的主因。

原因在於認同性的戮力報償，會使得行為者原本抱持較高的期待，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開放」的制度效應，與「防禦性」功效意識群體相較，認同性群體對於制度本身抱持較高的期望，認為能夠達到較高的滿足，但事實與期望卻造成極大的落差。顯然地，當個體對於原本對於該「消費產品」預期效益極高，結果卻是「實際作用」極低，這種落差會帶來更強的「政治失望」，從原本黨國吸納的公共性參與轉向「私人」參與的追求。進一步而言，「退出」的行動來自一種「轉向參與」、追求個別生活福利的情形。

## 二、「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不抱期待，不滿上升

「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選民所欲期望的政治回報，在選舉過程本身的作用不會受到滿足。此類選民追求乃是「物質性」效益，及基於「個人權益」，並出於「抵抗」思維。簡言之，選舉是作為公益性表達的制度工具，卻效益極低，卻非達到個人權益需求可以滿足的效果。就田野經觀察，社區基層選舉常見的景象是，是抗議群體時常透過選舉過程的「走過場」、「行禮如儀」表達政治不滿，選舉活動時常成為異議分子進行抗爭政治儀式的「表演場域」。客觀而論，對抗議群體本身，選舉卻達到凝聚公共議題及反抗網絡的效果，使得個人訴求轉為「公共化」，而呈現出從「私益」參與轉向「公益」參與的結果，對後續的反抗運動帶來正面的作用。

## 三、「低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無所變化，政治冷漠

經過選舉過程顯示，「認同性低，防禦性低」功效意識選民，並未受到選舉過程帶動影響，而「不入」政治，而無論是他的「政權支持」程度是高、或是低，都沒有出現政治功效意識。進一步而言，若我們將視為選舉視為「公共性的制度參與管道」，則「選舉」做為消費產品的作用確實的期待效用極低，若沒有其他政治參與管道（例如：選舉活動）的帶動，則政治功效意識並不會出現變化。事

實上，若我們觀察「認同性低，防禦性低」功效意識選民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先天對反抗黨國、但苦無政治學習的「政治疏離」者，另一方面則是有高黨國支持意識，卻未與社區基層選舉動員網絡產生關聯的參與者。我們可以推測，就長期而言，高黨國支持者可能選舉的政治涉入，走向「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情況（即功效意識長期仍出現上升）；反之，反抗黨國的參與者，在社區可能屬於低收入、先天弱勢的族群，長期而言，政治態度不易出現改變，卻也由於政治不滿更激烈的反抗行動。

總結上述，我們又可以觀察到兩種「退出」的情形，一種屬於行使緘默 (quiescence) 的退出公共參與，一種則是先天就「不入」政治。具有緘默意義的退出由於屬於「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選民由於政治失望出現的情況，在社區屬於高黨國支持群體，此種政治行動由「忠誠」走向「退出」的效應頗值關注，我們於下一節透過結合選舉的制度性意涵的分析架構進一步探討。

### 第三節 選舉開放的制度效應

對於選舉可能帶動的制度效應，現行研究觀點大致可區分為兩種取向：第一種是「投票偏好」，是以選民的投票行為的偏好取向作為分析起點，按照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 角度，選舉此項制度做為「個體偏好如何轉為集體選擇」的「加總機制」 (aggregation mechanism)，可透過「中位選民理論」 (Median Voter Theorem, Downs, 1957) 將選舉的「議題取向」建立一單維 (one-dimensional) 的「空間模型」 (spatial model)，候選人為了將選票效益極大化，將會將政見趨中，使最大多數群體有投票意願。第二種則是「資源控制」面，依上述觀點出發，Ricker 將原本的選票取向分析，轉從候選人的資源結構面思考，他依據「規模原則」 (size principle)，認為政治次級派系資源的交換予奪，勝者聯



盟會略高於少數聯盟，若是聯盟人數過多，反而會導致資源不足分配，此即「最小獲勝聯盟原則」(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 Riker, 1962:32)。據此觀察，基層居委會的選舉，由於「雙過半」的制度限制，使得選舉獲勝者勢必有所謂的資源交換，維持過半多數；而議題浮現亦透過社區選舉發酵，原本黨國動員空洞口號「社區建設」宣傳，亦逐漸被新興的社區問題爭議所取代，主導選舉的議題而日漸多元化，我們將於後續申述。最後，除了理性選擇論的制度分析角度，在本節我們嘗試結合，上節提出的 Hirschman(1982)-「私人-公眾」參與循環分析，以解釋「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個體，在「忠誠」走向「退出」的過程中，選舉的制度效應，究竟扮演了何種作用。

#### 一、「議題效應」：降低參與成本

基層選舉製造的議題效應最主要是「降低選民參與成本」，而有更多意願投入政治參與。選舉的進行，不單是黨國單方面的參與控制；事實上是發掘了更多「社區議題」，一個極為明顯的情況是，原本上海市的業主維權行動，在選舉後逐漸從「個人」參與而釀成「集體性」事件，這種與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成群結隊的情況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基層治理組織，如：居委會、地方黨支部等。在面對這類選舉誘發事件時，必須小心翼翼，而無法直接打壓。<sup>68</sup> 而選舉過程提供的集體性參與作用，使得反對群體如不費吹之力找到更強的「倡議網絡」，而有更強的政治功效意識，甚至足以「激發情緒、塑造悲情」，這種對於「被壓迫心態」集體儀式塑造，對於選舉的場域帶來的極大不同。進一步來講，社區的選舉活動漸被兩種「群眾運動」模式取代：一是效忠黨國忠誠的群眾號召；另一則是社會運動的抗議儀式。

---

<sup>68</sup> 這主要涉及到現行的基層結構問題，上海將居委會納入行政體系架構，建立「兩級政府（區、街道辦）、三級管理（區、街道辦、居委會）、四級網絡（市、區、街道辦、居委會）」。

這種高度行政化的結果，是上層單位為減少行政負擔，不希望居委會有太多爭議事件上升，希望一切在居委會解決，這使得居委會勢必要更多手段安撫、或是落得爭議性事件越鬧越大。

另一方面，社區議題的發現，使得原本高黨國支持者認知到又更多社區問題的存在，雖然囿於既有的結構侷限，使得「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在政治行動的選擇上，不會選擇「呼籲」，而從「忠誠」走向「退出」。但就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回到行動選擇背後蘊含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採取退出與呼籲的手段，取決於對組織參與付出的成本(Hirschman, 1970)，由於過往的「忠誠」(loyalty)參與，使得「退出」參與的成本較「呼籲」成本來的「更低」，而議題效應製造的參與成本降低，仍無法讓黨國忠誠者選擇進行「呼籲」。

## 二、「動員控制」：創造誘因結構

對於黨國支持者的參與行動抉擇，亦非如此悲觀。由於黨國支持者在經過選舉過程後，多數具備「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而選舉帶動的動員控制層面的作用是「創造誘因結構」。<sup>69</sup> 若黨國支持者在所屬群體出現對現狀不滿的情形，可能會尋求與社區反對者進一步潛在結盟，甚至達到「最小獲勝聯盟」，則至少能在社區居委會獲得少部分席次。<sup>70</sup> 正如 Hirschman(1982)指出的：

在消費強勁增長時期，人們對突然能夠支付得起新的耐用消費品有很高的期望，結果卻發現這些期望很少得到調整。

我們可將此視為「有限政治改革」(limited political reforms, 徐斯儉, 2004: 173-174; 桂勇等, 2003: 23; 楊敏, 2005)下有限選舉參與造成的政治失落。當消費慾望極高所購買的消費品無法滿足期望、達到標準時，結果消費者選擇的便

<sup>69</sup> 在此必須特別說明，此處的動員控制並非指黨國主動誘因選民動員參與，而是黨國支持者與反對者在社區尋求資源結盟採取的資源動員情況，特此區別。

<sup>70</sup> 在此處我們可以觀察到「雙保證」不見得完全帶動選舉的負面效應，黨國候選人若是少部分票源流失，則無法過半。但此時若有人選前忽然叛逃黨國，而左右逢源成功積聚票源，反而可能使選舉翻盤。如 LS、HQ 社區，訪談案例 5、6、7。

是「退出不玩」。中共基層選舉開放的有限政治改革使得參與者會在初期有較高的政治期待，這在黨國支持者身上的期望效應又會更高，但結果卻是帶來更強的「落差效應」。但另一方面，黨國反抗者卻透過選舉這項最低成本與最低效益的參與過程，試圖尋求更強的資源獲得，去創造更多的「誘因結構」，而走向過激行為(aggressive participation)的鋪墊。

然而，上述推論最讓人困惑地方在於，為何黨國支持者內部的少數反對者，最終仍有人走向與反對者「潛在結盟」，而非完全的參與退出？我們仍必須回到結構面的「創造誘因結構」尋求解答，而這涉及社區參與行動的最終論辯：「誰來創造『公共財』？」眾所周知，現存基層治理困境，在於社區有於有限資源，及社區居委會做為「公共物品提供者」(public good provisions)，卻處於治理機制未梢而難以提供較佳的服務，但選舉過程帶動了更多「主動者」參與，選民尤其是反對者有更多意願投入自身的資源，而非期待居委會主動落實治理效能。反對者不單是進行政治抗衡，而是由於認知「公共參與」必要性。「社區資源稀缺」與「選舉」搭配，選舉進一步創造了「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的投入，對於選舉的不滿創造了實質性的物質資源。諸如房舍改建、務業糾紛、社區環境維護等問題在選舉浮現後，社區參與者的自願投入，無形中創造強大的「社區認同」。在此種情況下，原本黨國支持者的轉向，有了實質的物質性基礎意涵，提供了最佳的資源整合配置，才有如此高的政治意願。

### 三、忠誠的代價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個體，由於政治失望，使得在政治行動從「忠誠」走向「退出」，對於現行選舉研究可能是極為有趣的發現。簡單來說，一個擁有較高政治忠誠的選民投入選舉，對黨國及執政當局，最終可能帶來極差的結果。對於現有的研究發現，共黨政權在動員式選舉過後，會帶來較高的政治

失望，過往往往將此種失望歸咎於參與熱情的冷卻、甚至是對於頻繁政治儀式彈性疲乏的結果(Furtak, 1990: 9-10; Bahry and Silver, 1990; Howard, 2003)。但從中國城市的基層選舉經驗顯示，問題顯然不在政治自主意願或熱情程度，選民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參與意願及政治能力，客觀而言，仍具有政治功效意識，失望在此並沒有扮演決定性作用。而另一方面，即便是「低認同性，高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個體，我們也不能等同若是採取過激政治行動，政治功效意識極出現下降的後果。現有研究顯示，進行政治反抗運動的參與者，都具有較高的政治功效意識（劉春榮、桂勇、陳周旺，2010）。

因此，箇中關鍵在於，選民的「忠誠」事實上是被選民視作「參與成本」衡量，從「忠誠」走向「退出」原因正在於，若是完全拋棄了對於黨國效忠，會對個體帶來更高的政治損益，結果是與執政當局徹底的翻盤，這有點類似理性選擇理論部分在解釋選民投票主因「公民責任」(civil duty)相似，因為拋棄公民責任可能會帶來社會群體更多的指責其沒有落實責任。不採取抗議，而走向「退出」，轉向個體的消費意願的社會福利的追求，相較之下沒有太大的壓力，不需負擔與黨國翻臉的額外成本。因此，「轉向的參與」仍是參與意願得到滿足的替代方式。

總結上述，中共政權出於參與需求採取政治動員，但由於「忠誠的成本」結果卻造成黨國支持者選擇「退出」，這顯然是難以預料的結果。另一方面，選民預期效應的不滿帶來了「政治失望」，出現轉向「私人參與」。假若「私人不滿」無法得到滿足，選民又如何宣洩？這或許符合現有「政權穩定論」求經濟表現保持政權的既有觀察，但當選民的期待效益再度喪失時，恐怕就是「過激行動」的浮現了（吳玉山，1998）。

## 第五章 結論

回顧二十世紀三波民主浪潮的推波助瀾，九零年代共產政權邁向轉型的震撼。「選舉」是雖第三波民主國家蛻變民主化過程有效的的政治甄選工具，通過民意檢驗和集體同意的過程，逐步擺脫威權政體的控制管道及資源的壟斷狀況，成為削弱和終結威權政體的途徑(Huntington,1994: 193-210)。但另一方面，從部分共產政權的選舉經驗，致使我們對於選舉抱持過度的樂觀。就此，Pei(2006)更指出，中共政權的弱化必然來自於市場轉型過程，內部資源分配的傾軋與互競，由此落入「轉型陷阱」，就此，中國城市基層政權的開放選舉、有限改革，是否足以帶動資源分配重整，乃至於治理機制的轉化，而頗值關注。

本論文最主要目的，一方面在於透過提出一個基層選舉參與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分析模型，提供解釋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的現況。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透過個案的觀察驗證檢驗模型的效用，並藉此「有限改革」的選舉參與的政治後果的觀察，探討未來中國基層治理機制的轉化情況。回頭關照現存理論文獻對話，特別是基層治理的「公共物品提供者」(public good provisions)及「集體行動困境」(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的現存見解，作者並在此與第四章發展效能-行動「銜接機制」：由於選舉失望浮現的「退出-呼籲」概念探討，就此進行一些理論層次的反省。

### 一、選舉參與、功效意識與「社區」政治行動

關照現存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參與的研究基礎，思考城市社區選舉，可以發現基層選舉的改革出發點最初是由「社區建設」所展開（林尙立，2006：5-8；邱崇原，2006；陳映男，2005；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542）。國家為建設社區，強化治理基礎；由是發軔，參與展開，試圖形塑民眾「社區認同」。由此衍生出兩項根本問題：「社區」應如何聚合？民眾又因如何參與？最後又延伸出一個最終命題：民眾應與國家基層治理機制如何進行參與互動，國家又應扮演何種角色？

回顧現存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現存的制度性參與管道（居委會選舉）導致了不同參與群體高低截然不同的情況，選民的選舉參與浮現政治功效意識上升、認同感由「國家-社區」轉變。客觀而言，城市基層選舉確實激起社區群體的參與熱情，出現了非預期的政治效應（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但另一方面，由基層治理機制使用「選舉動員」與「人情網絡」方式，是否足以造成民眾的參與聚合、「社區」形塑，並得以提供一個較佳的良性互動，仍尚待觀察。

本研究透過第三章 GR 社區與 HQ 個案的比較個案呈現，可以發現這種良性互動機制仍尚待摸索，社區行動的參與者雖然存在高度的政治功效意識，但在政治行動卻呈現「各有心思」盤算，值得注意的是，圍繞「社區建設」出發點展開選舉參與活動是徹底失敗的，「選舉動員」及「人情網絡」等作用並無法維持持續性的自主參與。進一步而言，選舉動員及人情網絡的並沒有提供一個較佳的帶動效應，基層治理單位對於動員及人情運用的效果近似一種找回傳統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雖然凝聚了部分的參與熱情，卻也逐漸走向退卻，GR 社區的參與情況最終導致了高熱情的參與者走向「退出」，外圍抗爭者持續盤算，對下階段的抗爭行為謀定而後動，出現自主的倡議網絡及潛在結盟。這種驗證否定了前言所述，現存見解最常出現的理論預設，社區選舉並未帶動群眾參與動機

下降，高度「行政化」與非「民主化」也不能完整描繪基層選舉的特性（桂勇等，2003；劉春榮，2005：124-129）。另一方面，既有結構制約的黨國遺緒，卻也可能製造更多的衝突與反抗群體的誕生。當然，若要認為社區選舉能形塑良好的社會資本，強化社區認同，為下階段與國家抗衡的準備，雖稍嫌樂觀（Read, 2000; 2003b；孫立平，2001；劉春榮，2007）。社區的參與群體，卻有更高的參與意願，投入自己的資源與網絡，選舉仍然使人浮現了現狀不滿。

中國城市的基層選舉呈現了某種情況的「參與困境」，參與者在制度環境不良的情況下，以有限理性進行了各種政治偏好計算。本研究因此認為，一個微觀個體心態，推估參與困境所可能採取的手段的分析模型，才是解釋現存政治行動的較佳解答。我們透過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組合「認同性」與「防禦性」，分析個體在面臨選舉過程下，可能採取的政治行動。研究結果推翻了「社區建設」以及社區的群體參與聚合，會呈現良性發展的看法。在「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選舉過程失望走向「忠誠-退出」的行動替代機制，是典型的印證。這凸顯了現存社區基層治理機制，及民眾的群體參與間，欠缺良性互動的嚴峻現狀。

## 二、基層的「集體行動困境」與政治發展的「線性邏輯」

承接所述，本研究認為，環繞著「社區建設」及「選舉參與」展開的中國城市基層治理機制的論辯，質言之，尚涉及了「由誰來」提供「公共產品」及「集體行動困境」這個社會科學的經典命題。回顧過往的理論探討，舊有的典型見解認為，強化基層官僚的治理能力及公民社會監督(Dhal, 1971; O'Donnell, 1996)，是解決基層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方式。與之迥異，東方經驗的發展國家則顯示，透過「國家-社會」的「鑲嵌自主」(Embeddedness Autonomy)關係及公私協同的

網絡機制(Evans, 1995; Lam, 1997)，會提供較佳的公共產品。就理論典範而言，Putnam(1993; 2000)認為社會資本的型塑及群體認同的「信任」機制，會降機訊息成本，是群體避免集體行動困境。Ostrom(1990)則認為良好的制度設計將避免公共資源耗竭的群體搭便車(free rider)情形。

就當前中國基層選舉的集體行動困境，我們可以發現，城市基層治理機制尚未形塑出良好的制度設計，並欠缺社會資本降低參與成本；另一方面，GR 社區個案表現了，當黨國與社區基層走向互相仇視的情況，要實現東亞經驗的公私協同網絡的發展路徑，亦將極為困難。事實上，當社區問題浮現時，國家基層治理機制的芻弱，與社會網絡的欠缺聚合，都無法提供較佳的公共產品。這是否意味我們最終必須期待一個強大的社會力量，與之抗衡，雖是遺憾但可能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與之相應，作者認為透過「議題塑造」及「誘因結構」發現，在「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由於參與動機擁有了自主意願的資源投入，社區問題不再單是「搭便車」問題，而是至少有人肯投入，癥結在於是否有人投入資源進行潛在的結盟，轉化改變目前的嚴峻狀況。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如社區的「雙保證」法規要求，並非完全是有利黨國的法規，黨員候選人也有可能流失部分票源而落選；反之，若能成功形成社區不同參與群體結盟，就會出現意外當選的狀況。過半的要求同時使得候選者更有意願進行妥協資源分配，黨國必須面對有人會叛逃的「潛在誘因」，結果是只能「分而治之」，試圖「左右逢源」，擺平各種社區力量，結果可能就是招致自身基層政權的弱化結果。進一步而言，當黨國最終走向逐步削弱、漸而讓位，最終可能就是強大社區自主力量的誕生，「公共產品」將由社區自己來創造。

進一步而言，在第四章進一步的觀察驗證，可以發現受限於黨國忠誠心態，使得「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再採取「呼籲」的政治行動皆充面



臨極高的行動成本，最終走向「退出」，致使我們對其要投入參與難以期待。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選舉過程失望走向「忠誠-退出」的行動替代機制，反映的是「選舉本身」的制度效應，將會加劇參與者的失落感。就此，史天健(Shi, 1999)認為此種緘默的「退出」具有強烈的政治不滿意義，更只有決心挑戰政權合法性的此會如此表達。熊易寒（2008：188）則認為是政治冷漠而非反抗的表現。作者認為，上述觀點皆具有一定解釋力。但癥結仍在於，若參與者仍有自主意願，應如何獲得滿足以解決個人失望的情形，Hirschman(1982)就此提出的「轉向參與」極具參考意涵。我們認為，當黨國忠誠者的「高熱情」、走向「高冷漠」的情況，仍將使得參與者更有意願表達不同的政治意見，私人參與若是難以滿足，將能會走上公共參與的路徑。就黨國忠誠者的角度，「退出」的低成本較「呼籲」的高成本來的風險更低，又至少帶給基層組織一定的壓力。就當前而言，我們寧無法判定退出會是真正抗議的前奏，或者是長期的「緘默」。但不能否認的是，「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走向真正的「退場」，將為外部抗議累積足夠的動機。

總結上述，社區基層組織的參與現狀極為類似 Hirschman(1970)的「退出、呼籲、忠誠」分別產生作用，可能出現一較佳的群體參與狀況<sup>71</sup>。而當中共執政當局須面對「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由於「公眾參與」轉向對「私人產品」如增進社會福利、個人所得上升等較高的「私益」追求，只能持續維持「高經濟表現」，否則終將會導致下一步生活不滿造成的社會抗議（吳玉山，1998）。總而言之，在破除前述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預設後，「高認同性，

<sup>71</sup> 按照 Hirschman(1970)關於「退出-呼籲-忠誠」三種參與行動討論。認為個體在面對參與組織(如：國家、企業、政黨等)的績效衰退時，「退出」與「呼籲」交錯的參與行動對刺激績效提升，會有極佳的效果。但這種情況在公部門必然得介入同時涉及私人與公共同時重疊的事務，拿捏變得極為困難。舉個情況來說，公部門為了國家教育品質經營公立學校，當公立學校經營績效不彰時，家長最好的選擇是採取「呼籲」提昇績效(要求改善產品質量)，而非選擇「退出」轉學就讀私立學校(選擇替代性產品)。最適情況應是，公立學校家長不選擇退出，而公立學校會受到「呼籲」提昇，並會與私營教育機構達到競逐，提高公共產品效益。但結果卻是個體的有限理性下，導致了集體行為受到「偏好誘導的均衡」(preference-induced equilibrium, Shepsle, 1986)，大家都會選擇退出的結果。

低防禦性』功效意識退出—『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呼籲」的參與機制組合，反而可能基層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方法。這似乎也印證了中國政治發展，及民主前景的「非」線性邏輯，雖是匍匐前進，卻是尚有轉圜餘地。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王邦佐，2003，《居委會與社區治理：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組織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左志堅，2006，〈上海進行建國後最大規模的基層民主試驗〉，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查閱時間：2010/1/26。
- 王信賢，2006，「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以 W 市商會與行業協會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2): 293-326。
- 吳玉山，1998，〈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9: 443-464。
- 吳玉山，2007，〈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載於《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徐斯儉、吳玉山主編，臺北：五南出版社。
- 吳重禮、湯京平、黃紀，1999，〈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選舉研究》，2(6): 23-44。
- 李凡，2004，〈中國大陸城市社區基層民主發展背景〉，載於《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研究》：23-50，朱新民主編，台北：遠景基金會。
- 李凡主編，2006，《2005 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北京：知識產權。
- 李明輝，2001，〈儒家傳統與東亞的現代化——從李光耀與彭定康關於「亞洲價值」的爭論談起〉，載於《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劉述先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林尚立，2006，〈基層組織：執政能力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戰略資源〉，《理論前沿》，9: 5-8。
- 林尚立主編，2003，《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台北：社會科學文獻。
- 林佳龍，1998，〈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1946-1994）〉，載於《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陳明通、鄭永年主編，臺北：月旦出版社。
- 邱崇原，2006，〈轉型中的威權政體：城市基層選舉與黨國權力重塑〉，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基層選舉研討會，2006 年 12 月 9 日，臺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孫立平，2001，〈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育〉，《學海》，4: 93-96。
- 孫立平、郭於華，2000，〈軟硬兼施：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過程分析：華北 B 鎮定購糧收購的個案研究〉，載於《清華社會學評論》第一輯，廈門：鷺江出

- 版社。
- 徐斯儉，2004，〈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載於《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林佳龍主編，臺北：時報文化。
- 桂勇，2007，「鄰里政治：城市基層國家的權力操作策略與國家-社會的『黏連』」，《社會》，6: 102-126。
- 桂勇、黃貴榮、李潔瑾、袁靜，2003，〈直選：社會資本還是行政推銷民主？〉，《城市管理》，6: 22-25。
- 耿曙、陳奕伶，2007，〈中國大陸的社區治理與政治轉型：發展促變或政權維穩？〉，《遠景基金會季刊》，8(1): 87-121。
- 耿曙、陳奕伶，2008，〈發展策略與政權體質：走向「內分—外聯」體制的中國大陸〉，《社會科學論叢》，2: 191-222。
- 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有限改革的政治意義：中國大陸動員式選舉參與對其成居居民參與意識的影響〉，《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20(4): 513-552。
- 陳偉東、李雪萍，2004，〈社區民主治理的理論假設與案例分析〉，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研究》：85-107，臺北：遠景基金會。
- 陳偉東、姚亮，2005，〈選舉行為背後：投機博奕：以武漢市 C 社區居委直接選舉為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4 (3)：61-66。
- 陳陸輝，2002，〈政治信任感與台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選舉研究》，9(2): 65-84。
- 陳陸輝，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對台灣民主的展望〉，《臺灣政治學刊》，7(2): 149-188。
- 陳義彥、陳陸輝，2002，〈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0 月 19-20 日。臺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陳映男，2005，〈當單位遇見居委會：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治理體制的轉型〉，《東亞研究》，37(6): 157-182。
- 黃光國主編，1988，《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
- 楊敏，2005，〈公民參與、群眾參與與社會參與〉，《社會》，2005(5): 78-95。
- 楊敏，2006，〈誰參與？為何參與？如何參與？——對城市不同居民階層社區參與過程的個案研究〉，第三屆組織社會學實證研究工作坊，2006 年 10 月 21-24 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
- 敬義嘉、劉春榮，2007，〈居委會直選與城市基層治理——對 2006 年上海市居委會直接選舉的分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1)：132-140。
- 劉春榮，2005，〈中國城市社區選舉的想像：從功能闡釋到過程分析〉，《社會》，2005(1): 119-143。
- 劉春榮，2007，〈另類的鄰里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年度學術 2007：治與亂》：374-39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劉春榮、桂勇、陳周旺，2010，〈爭議政治的行為邏輯：對中國城市業主利益表達的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輯刊》，2010(31): 67-93。

- 劉軍寧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1994，《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出版社。
- 劉嘉薇，2006，〈選舉作為一種動員—上海市居民委員會選舉之探析〉，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基層選舉研討會，2006年12月25日，臺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熊易寒，2008，〈社區選舉：在政治冷漠與高投票率之間〉，《社會》，2008(3): 180-227。
- 邊燕杰，2002，〈找回強關係：中國的間接關係、網絡橋樑和求職〉，載於《中國社會學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二、英文部分

- Abramson, Paul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CA: W.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minzade, Ron and Doug McAdam. 2001. "Emotion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s. Ronald R.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lch, George I. 1974.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 (2): 1-43.
- Barry, Brian, and Russell Hardin, eds. 1982. *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 Browning, Rufus P., Dale Rogers Marshall, and David H. Tabb. 1984. *Protest Is Not Enough: The Struggle of Blacks and Hispanics for Equality in Urban Politics*.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owning, Rufus P., Dale Rogers Marshall, and David H. Tabb, eds. 1990. *Racial Politics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NY: Longman.
- Burns, John P. 198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Chen, Jie. 2004.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ie, and Yang Zhong. 2002.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s* 64 (1): 178-197.

- Collier, David, and James Mahoney. 1996 "Insights and Pitfalls: selection Bi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49 (1): 59-63
- Craig, Stephen C. 1979. "Efficacy, Trus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n Attempt to Resolve a lingering Conceptual Dilemma."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7 (2): 225-239.
- Dahl, Robert A. 1961.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Charles L. 1976. "The Mobilization of Public Support fo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the lower Class in Mexico C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XX (4): 653-669.
- Deutsch, Karl W. et al.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Westport, CT: Greenwood.
- Diamond, Larry. 1999a. "Limited El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Does Limited Democracy Lead to Democracy?" Mar. 5-6,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 Diamond, Larry. 1999b.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1997.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Easton, David.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4): 435-457
- Easton, David. 1979.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aston, David, and Jack Dennis. 1967.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1): 25-38.
- Eckstein, Harry. 1975.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Strategies of Inquiry*, eds.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Eckstein, Harry. 1992. *Regarding Politics: Essays on Political Theory, Stability, and Change*.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lkenheim, Victor C., ed. 1987.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Finkel, Steven E. 1985. "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2): 891-913.
- Finkel, Steven E. 1987.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a West German Panel." *Journal of Politics* 49 (2): 441-464.
- Friedgut, Theodore H. 197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iedrich, Carl J.,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1965.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urtak, Robert K., ed. 1990. *Elections in Socialist State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Gao, James Z.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Gerring, John. 2001.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Framework*.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ley, Bruce. 2004.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 Grimshaw, William J. 1992. *Bitter Fruit: Black Politics and the Chicago Machine, 1931-1991*.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terbock, Thomas M. 1980. *Machine Politics in Transition: Party and Community in Chicago*.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ward, Marc Morje. 2003.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Nelson.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Bruce. 1979. "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 Kan-Ch'ing and Kuan-Hsi in a Rural Taiwanese Town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78: 237-273.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2001.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m, Wai Fung. 1997.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 In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ne, Robert E. 1959.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Glencoe, IL: Free Press.
- Li, Lianjiang. 2011. "Distrust in Government Leaders, Demand for Leadership Change, and Preference for Popular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Behavior* 33 (2): 291-311.
- Mann, Michael. 1988.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 State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and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than, Andrew J. 2003.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663-681.
- Nee, Victor. 1992. "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 267-282.
- O'Donnell, Guillermo. 1996.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2): 55-69.
- Olson, Mancur. 1968.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 Sons.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ark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



- Read, Benjamin L. 2000.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Nerve Tips."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806-820.
- Read, Benjamin L. 2003a. "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rhood? 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a Journal* 49: 31-59.
- Read, Benjamin L. 2003b. *State, 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 Riker, William H.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Schurmann,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and enlarged ed.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 Tianjian. 1999.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61 (4): 1115-1139.
- Shepsle, Kenneth A.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ed. H. Weisenberg. New York: Agathon.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Townsend, James R. 196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G. 198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iner, Myron. 197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ri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s. Leonard Binder, James S. Coleman, Joseph LaPalombara, Lucian W. Pye, Sidney Verba, and Myron Wein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ames Q. 1973.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附錄一：訪談案例

編號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內容
1	20090714	E01 復旦大學	熊易寒、李輝老師
2	20090722	復旦大學	劉春榮教授
3	20090724	上海 CL 社區	姚華教授
4	20090727	復旦大學	桂勇教授
5	20090725	C02 靜安區 HQ 社區	社區居民陳教授
6	20090725	C05 靜安區 HQ 居委會	選舉觀察記錄
7	20090727	C11 長寧區 LS 居委會	參訪觀察記錄
8	20090729	C-06 靜安區 HQ 居委會	參訪觀察記錄
9	20090729	C01 靜安區 HQ 居委會	樓組長王先生
10	20090729	C03 靜安區 HQ 居委會	年輕社工葉小姐(E)
11	20090731	C09 上海大學	居委會社工陳組長
12	20090802	復旦大學	參訪 HQ 社區學生劉同學
13	20090804	B19 CL 居委會	選舉觀察記錄
14	20090804	B24 CL 居委會	居委會顧主任
15	20090811	E-04 上海師範大學	姚教授
16	20090815	C07 CS 二村	樓組長柯女士
17	20090815	C08 CS 二村居委會	選舉觀察記錄
18	20090817	上海社科院	市政府職員錢先生
19	20100728	上海社科院	政大團隊邱崇原同學
20	20100817	閔行區 GR 社區	居委會委員吳女士
21	20100817	閔行區 GR 社區	社區人士馬老師
22	20100817	閔行區 GR 社區	業委會委員高老師
23	20060825	閔行區 GR 社區	2006 年政大團隊參訪資料
24	20070804	閔行區 GR 社區	2007 年政大團隊參訪資料
25	20070824	閔行區 GR 社區	社區人士江老師
26	20060819	寶山區 DG 二村	2006 年政大團隊參訪資料
27	20100717	閔行區	區政府、街道辦官員

## 附錄二：訪談題綱

### 社區背景

社區居民的社會屬性？ 社區建立時間？ 居委會何時建立？

### 動員網絡連綴與政治參與、與黨國支持

社區平時鄰里關係如何？ 你是否時常與社區成員互動？

有些人會比較熱衷互動嗎？他們對於黨、國家的看法如何？

社區成員有誰比較喜歡發表政治見解？

這些社區成員他在表達他的不滿或滿意時，他是怎麼看待國家？

他在選舉時的政治參與程度如何？他會表態他的立場嗎？

這些特定政治立場的人，他們對於選舉程序會有甚麼要求？

### 訊息接收與選舉流程(參與實際情況)

訊息來源有哪些種類？ 是否理解選舉流程？

你在選舉環節中扮演何種角色？

### 選舉動員過程

你被動員時，會樂意參與？還是興趣缺缺？或是感到憤怒？

選舉投票是人情壓力/上級壓迫？你願意接受？或不接受？

你自己有意願投票嗎？你投票時的主觀想法是甚麼？

### 政治功效意識

你相信選舉嗎？若不相信，你為何還投票？

你在投票選擇時是根據自我利益(工具性立場)?還是在表態認同國家(認同性立場)？

你會提名自己偏好的候選人嗎？或不去投票？還是支持居委會與黨規劃候選人？

你比較希望投票結果能反映自我訴求？還是反應社區/群體利益？